

論雕有東夷系紋飾的有刃玉器（上）

鄧淑蘋

國立故宮博物院

【內容提要】本文是在完成了〈雕有神祖面紋及相關紋飾的有刃玉器〉一文後，赴太原、西安，仔細觀察了出土於山西黎城的玉戚、陝西蘆山峁的玉刀，得到新的啓發後，從事進一步的研究，所提出之論文。

二十餘年來，學術界已有多篇論文，討論流散於世，為數甚豐的，一批雕有鷹鳥、老虎、神祖面紋（常稱為「獸面紋」或「人面紋」）的玉器。這類玉器主要分兩類，其一為有刃器，如圭、戚、刀等；其二為嵌飾器或佩飾器。學者們最初依憑山東日照兩城鎮出土的玉圭，將此類玉器定位為山東龍山文化的遺物；並根據傳說史料中，古代東夷族的鳥崇拜信仰，而釋此類玉器為東夷族的玉禮器。

近年，兩湖地區的石家河文化遺址中，出土了這類玉嵌飾器與佩飾器，因此令學者們改變看法，推斷傳世器中的相關玉器，多屬石家河文化遺物。對於山東與兩湖這兩處相距甚遠的地區，卻出土風格相似的玉器，曾有學者釋之為東夷族中的一支——蚩尤，在涿鹿大戰失敗後，向西南方的移民。

筆者除繼續收集可靠的傳世器外，並追蹤相關的出土器，如：黎城戚、蘆山峁刀等。共得二十八件有刃器，仔細分析其花紋的類別、組合關係、發展與演變，並綜合考量器形、玉質特徵等，佐以傳說史料等文獻，作了進一步的研究。初步推斷這類玉器的製作時間約為西元前二六〇〇至一五〇〇年，即是龍山時期至二里頭文化期，其中包括了夏代。而雕琢的地

區頗為廣泛，遠至山西、陝西、甘肅、江南、兩湖，都可找到東夷式花紋的玉器。這一現象反映了東夷文化的勢力強大，遷徙分佈的範圍很廣。

大致而言，所雕的神祖面紋主要分為甲、乙、丙三式。甲式為具像人面，有人的五官、披長髮、戴圓耳環與兩角下垂的船形帽。乙式為抽象面紋，又可分為四式，其基本特徵為：常以多層環繞圓轉線紋構成眼睛，頭側左右橫出尾端彎翹的「牛角裝飾」，頭頂有「介字形頂」，經分析，筆者以為這應是「牛」的抽象表現；丙式是由乙式發展而成，多以平直短線構成，造形更為抽象。在有刃器上，這些花紋多以二元對立的關係存在，主要有（一）鷹鳥與神祖，（二）甲式神祖與乙式神祖，（三）虎與甲式神祖，共三種二元對立的關係。雖然甲、乙二式神祖面紋，應有不同的屬性，但在少數的有刃器上，已出現二者的混合形象。到了石家河文化中的嵌飾器上，更是以具像的甲式神祖面，加飾原屬乙式神祖才有的「介字形頂」與「牛角裝飾」。

經風格分析，可確認其中八件屬典型山東龍山文化遺物，花紋中鷹與牛的二元對立關係，或即為東夷中的「少昊」與「蚩尤」的圖像。其餘多件呈現複雜的時代與地域特徵，這些混合了華東與華西，早期與晚期風格之玉器的存在，提供我們新的思考方向。由於古文獻中，不少有關東夷族的支系，如：蚩尤的黎族、嬴秦、少昊摯等，向西、向南播遷的紀錄，正與本文依據實物所分析的傳播與演變情況，大致相合，雖然探討古代文化的變遷與傳播，是複雜的問題，作者仍盼以此小文，對中國文明形成時期的氏族關係、玉禮器制度等研究，提供正面的佐證。

一、前言

一九九六年十一月，我有機會親自觀察了出土於江蘇溧陽，雕了山東龍山文化風格花紋的玉圭，由於它出土於良渚文化

的地域範圍內，對於它的文化歸屬，究竟是龍山還是良渚？曾引起學者們的熱烈討論【註一】。為此，我將相關的資料，包括出土的、徵集的，以及傳世的、流散的【註二】，雕有相關紋飾的玉器，作了一番整理。由於資料十分豐富，牽涉的問題也極複雜，不易在一篇論文中，作通盤性的討論；又正值山東大學考古系的劉敦愿教授過世，他是早年獨具慧眼地，徵集並發表日照兩城鎮玉圭的前輩學者，該玉圭正是這一專題研究的重要關鍵之物；為此，我就先選擇了二十六件有刃器，主要包括圭、戚、刀三種，於一九九七年夏天，草撰了〈雕有神祖面紋及相關紋飾的有刃玉器〉一文（以下簡稱〈神祖面紋有刃器〉），發表於山東大學考古系為紀念這位前輩學者，所編撰出版的紀念文集中，論文集已於一九九八年夏季出版。

在撰寫該文時，曾涉及山西黎城出土的一件玉戚，它曾發表於一九八〇年的《山西出土文物》中，但書中並未交代清楚。由模糊的黑白圖片，我隱約看出器表的中段兩側雕有花紋。所以我也在前述拙文中，呼籲有關單位儘早公布清楚的圖片，有利於學術討論。拙文交卷後的秋天，山西省博物館舉辦了晉、陝、豫三省古玉聯展，這是一次非常精彩的展出，我在展期結束之前，及時趕到太原參觀。非常幸運地，黎城玉戚也在展出之列。更蒙該館保管部李勇主任的協助，於下展後讓我仔仔細細地觀看它的兩面，對其花紋結構，有了全面的瞭解。

離開太原，前往北京，又在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中，蒙任式楠所長及胡秉華先生的協助，仔細觀察了山東滕縣前掌大出土的商代玉器，對一件結合了神祖面與鷹鳥兩種母題的玉飾（考古學報一九九二·3中稱作「獸面形玉飾」），有了較清晰的認識。

一九九八年春，我又在西安親自觀察了徵集自陝北延安蘆山峁的大玉刀，發現在其一側端，雕琢了十分寫實的側面人

【註一】：溧陽圭發表於汪青青：《溧陽出土的良渚文化玉器珍品》，《東方文明之光——良渚文化發現六〇週年紀念文集》，（海南國際新聞出版中心，一九九六。）在該書的第六八頁下方，記述兩派學者的不同意見。

【註二】：「傳世器」一詞，是指已在歷史上流傳甚久的古物，例如故宮博物院的藏品。「流散品」一詞是指本世紀中，因盜掘出土而流散於世，經買賣而進入各公私收藏的古物。二十世紀中，曾有兩個古物盜掘的高潮，第一次是在兩次世界大戰之間的十餘年。後一次則是在中國改革開放後，即八〇年代的後半以後迄今。

臉，輪廓與本文討論的甲B式神祖像相同，其五官起伏正形成了凹凸的齒稜。又得陝西省文物局文物處劉雲輝處長善意提供出土於山西侯馬窖藏的一件鷹紋圭的拓片，並告知這件傳聞已久的玉圭，已於一九九六年出版。（詳後）使得相關紋飾的有刃器又增加了二件【註三】。新資料的增加，以及與同好們的切磋，令我對複雜的古史現象，有了更深的認識，對前述拙文中的某些論點，必須加以修正。故再撰一小文，盼能對這一廣為學界關注之專題研究，增加一些新的動力，也希望引起更多的討論。

二、各種相關紋飾解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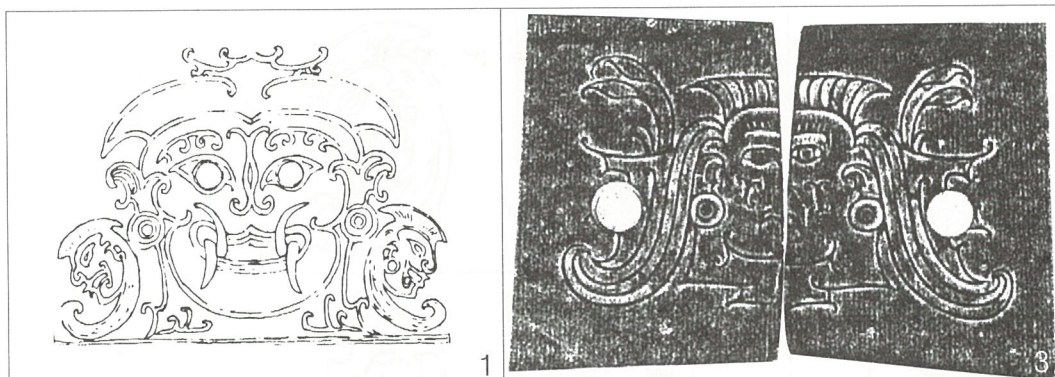
由於本文是延續〈神祖面紋有刃器〉一文所做的討論，但是一些基礎資料，必須先行交代清楚。為免混淆起見，擬繼續沿用該文中對各種紋飾的總編號。但前文因考慮製圖的方便，儘量採用線繪圖，所以省略了一些尚無線圖的照片。筆者擬在本文中將這些照片補齊，並加入新獲得的黎城玉戚花紋線繪圖，以及侯馬圭、蘆山峩刀的紋飾。由於本文的圖片較多，所以在總編號之下的分號是不同的。除此之外，並依新的認識，將原有的圖七：1、2（即本文圖七：3、4、5）上下反轉，以配合本文的討論。圖版說明的括弧中，註明紋飾所屬的器名。

〈紋飾名稱與編號〉：

甲A式，正面具象神祖面紋。（圖一）基本特徵為：長髮、戴船形帽與圓耳環。細節處頗多變化，如圖所示：之1有獠牙，之2無長髮與冠帽，之3被切成兩半，分別雕於器邊的兩面，但細觀其眼睛及口鼻等五官的表現，仍屬正面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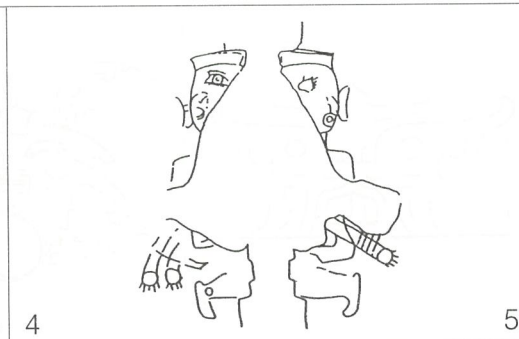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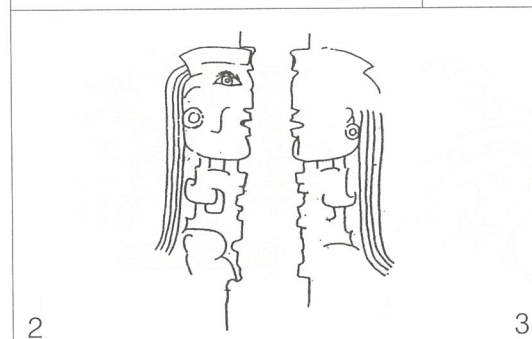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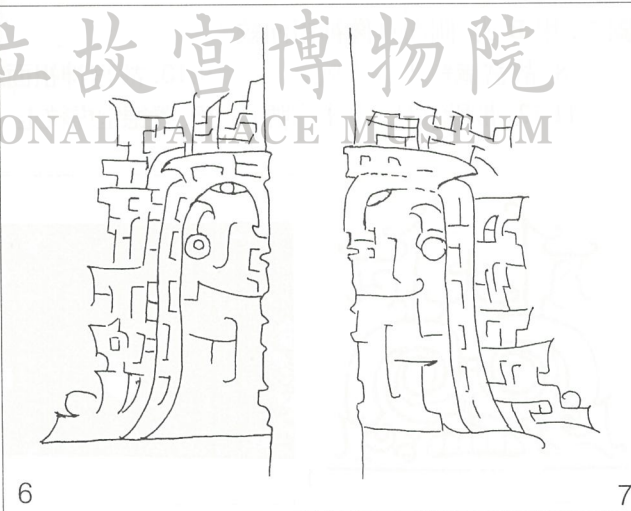
甲B式，側面具象神祖面紋。（圖二）基本特徵為：長髮、戴船形帽，有時還戴圓耳環。之8、13是平刻於器表的。之1、7則分別雕於弗利爾刀、故宮神祖面紋戚、黎城戚的器邊，且兩兩成對地分別雕於同一玉片邊緣的兩面（圖二：1飾於

【註三】：《考古》一九九七·11公布了內蒙古敖漢旗出土的一件，被訂為夏家店下層文化的玉圭，但據某些曾見過實物的學者告知，這件傳為海關沒收的玉器，可能不是上古時期的玉器。由於筆者尚未有機會見到實物，故暫時不收錄該件。



圖一,甲 A 式 正面具象神祖面紋:

- 1, 故宮神祖面紋圭(九號)
- 2, 弗利爾圭(十一號)
- 3, 上海刀(二十五號)



圖二,甲 B 式 側面具象神祖面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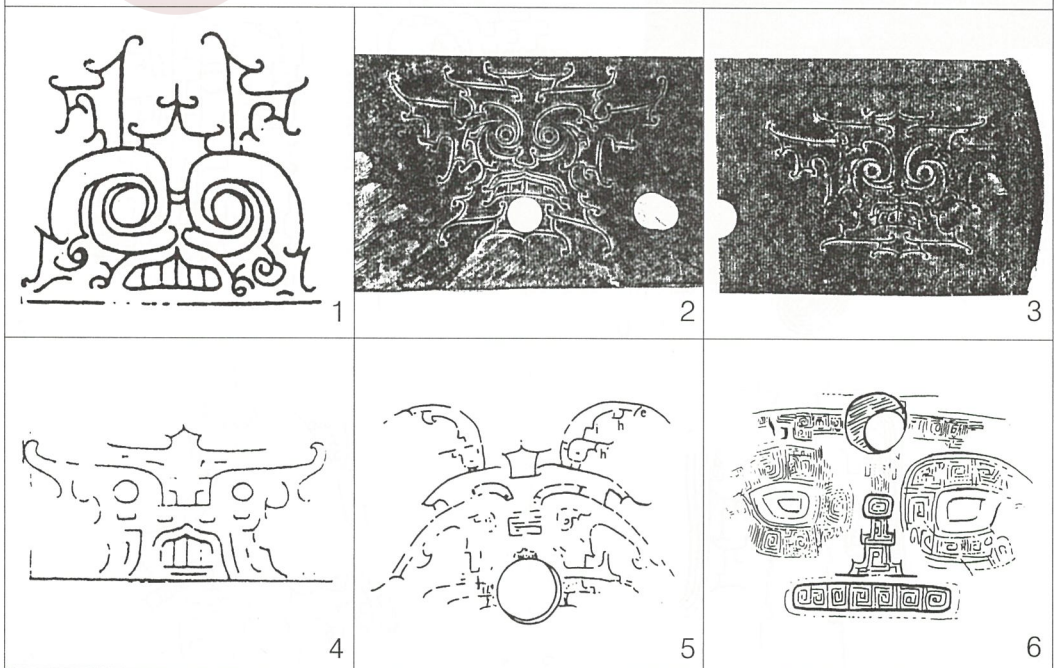
- 1, 弗利爾刀(二十六號)
- 6,7, 黎城戚(三號)

- 2--5, 故宮神祖面紋戚(二十三號)



圖二, 甲 B 式 側面具像神祖面紋 :

- 8, 故宮鷹紋圭 (十號) 9, 10, 故宮神祖面紋圭 (九號)
11, 12, 弗利爾刀 (二十六號) 13, 養德堂虎紋圭 (二十二號) 14, 蘆山峯刀 (五號)



圖三, 乙 A 式 有口抽象神祖面紋 :

- 1, 兩城鎮圭 (一號) 2, 3, 上海刀 (二十五號) 4, 溧陽圭 (二號)
5, 溫索普圭 (十六號) 6, 芝加哥圭 (十七號)

弗利爾玉刀柄端側邊的兩面，但僅公布了一面的圖像）。之玉琢於蘆山崩刀的器緣，線條乾淨俐落而寫實生動。神祖面像的帽緣、額、鼻、口、頰等，形成器邊凹凸的齒稜。由此可知，古代玉器上的「齒稜」，的確是源於神祖側面像的五官起伏。由於有齒稜的玉器頗多，雖然大多數器表光素，但林巳奈夫先生曾於一九九一年依據弗利爾刀的側面頭像（圖二：1），提出古代玉器的齒稜是象徵「氣」的說法【註四】。迄今又多了三件玉器的紋飾可以為之佐證。

乙A式，有口抽象神祖面紋。（圖三）多雕琢於玉器器表的重要部位，構成主體花紋。整體而言，乙A式與乙B式大體相似，只是乙A式雕出神祖的口部。二式的基本造形為：以一對多層環繞圓轉線紋構成的眼睛為中心，向左右橫出長而彎翹的，既似寬邊大帽，又似牛角般的裝飾，正上方有「介」字形的冠。這種上翹的裝飾線，有時會變得向下彎垂，如圖三：5相似於臨朐朱封出土玉頭飾【註五】。圖三：6是一件變例，它的紋飾近似良渚文化風格，但眼的中央部分相似於圖三：5或圖四：7的神祖之眼，且雕於器形屬龍山文化風格的玉圭上。在尚無相似的它例前，暫將花紋列於此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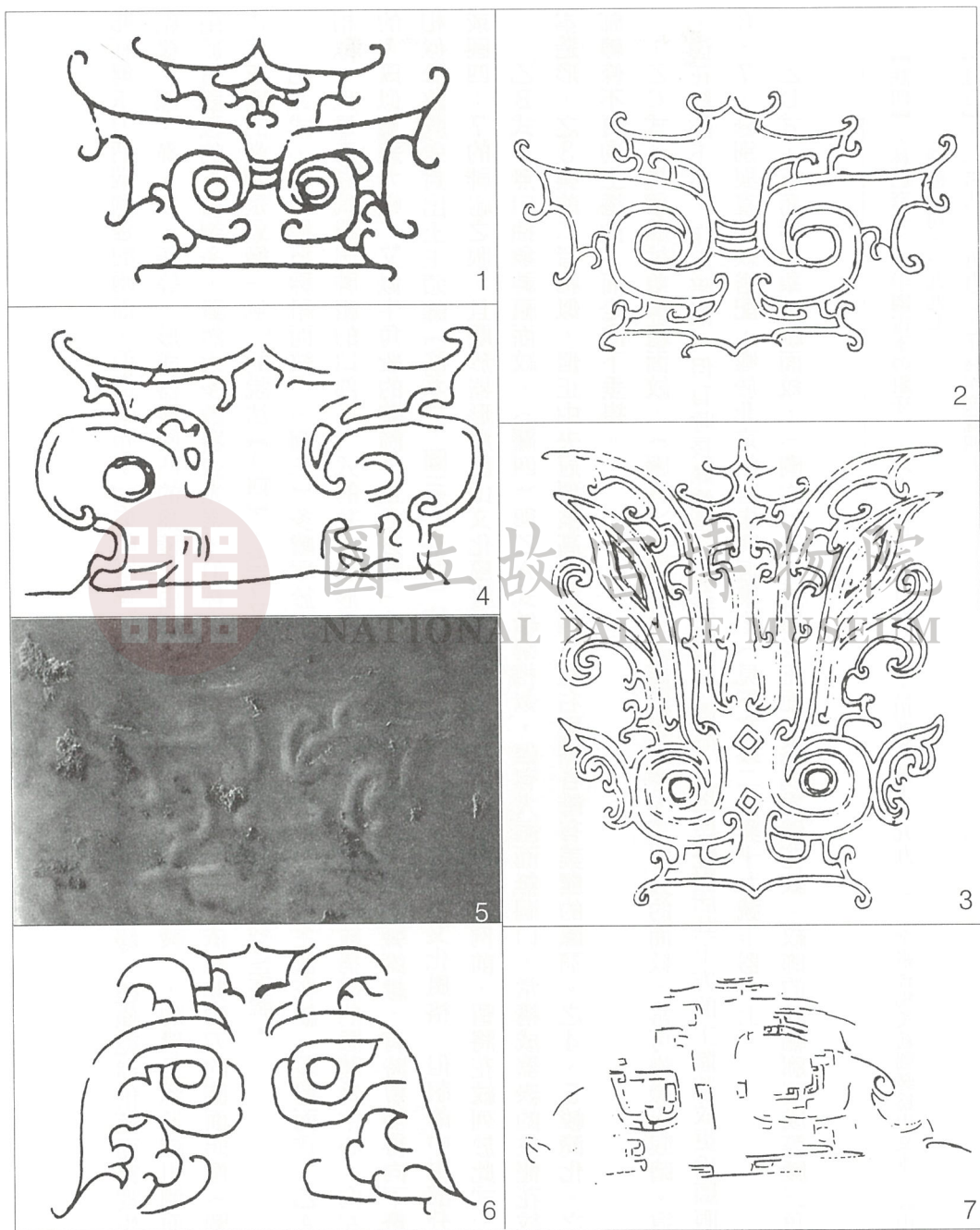
乙B式，無口抽象神祖面紋。（圖四）與乙A式結構相似，但有大眼而無闊口，常構成器表的主體花紋。之1、2為基本造形，之3與前二者相似，但正中央冠頂被高高抬起，左右兩側各飾有美麗的鳳羽。之4、5較簡化。之6、7的兩側裝飾線條不再向上捲曲，而是向下垂掛。

乙C式，長帶狀抽象神祖面紋。（圖五）多雕琢於長條形飾帶中。正中央的面紋，常可辨識出眼睛。這種紋飾多安排於主體花紋的下方，作為陪襯。但有時長條飾帶也發展得寬大顯眼，反而較位居其上方的主體花紋更為顯眼。如本式之5、6、7，分別與直線紋搭配，雕於北京故宮圭與何東圭（見下文第二十與十九號玉器）上。

乙D式，三角形抽象神祖面紋。（圖六）多飾於器表正面，形成主體花紋。紋飾的外輪廓略成等腰三角形，以中央為主

【註四】：林巳奈夫：〈中國古玉の鉏牙〉，《中國古玉の研究》，（吉川弘文館，一九九一）。全書經楊美莉翻譯為中文本。《中國古玉研究》，藝術圖書公司，一九九七。

【註五】：《考古》一九九〇・7見本文圖四七。



圖四, 乙B式 無口抽象神祖面紋：

1, 兩城鎮圭 (一號)

3, 故宮鷹紋圭 (十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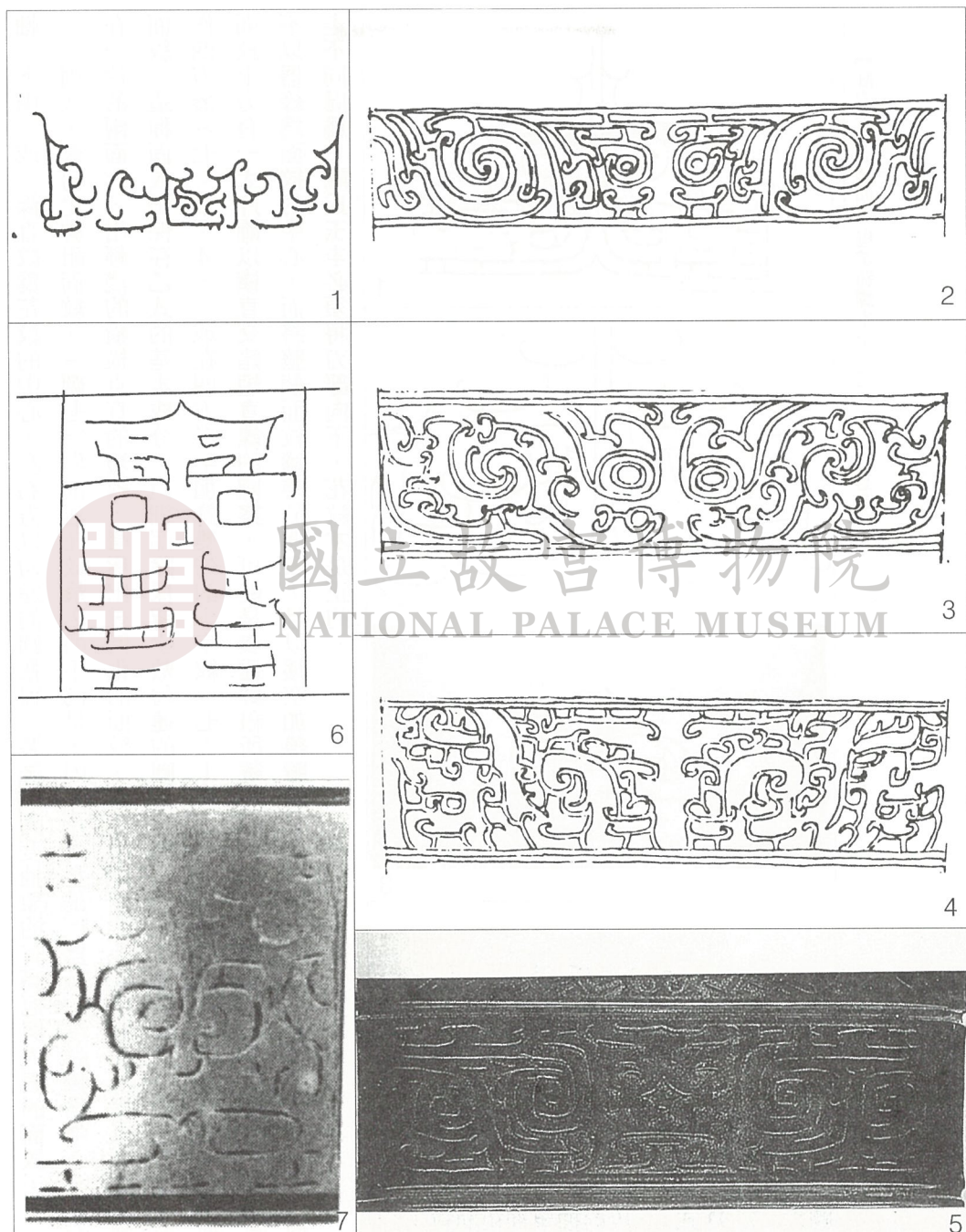
5, 藍田圭 (十三號)

7, 沙可樂刀 (二十七號)

2, 故宮神祖面紋圭 (九號)

4, 上海圭 (十二號)

6, 天津圭 (十四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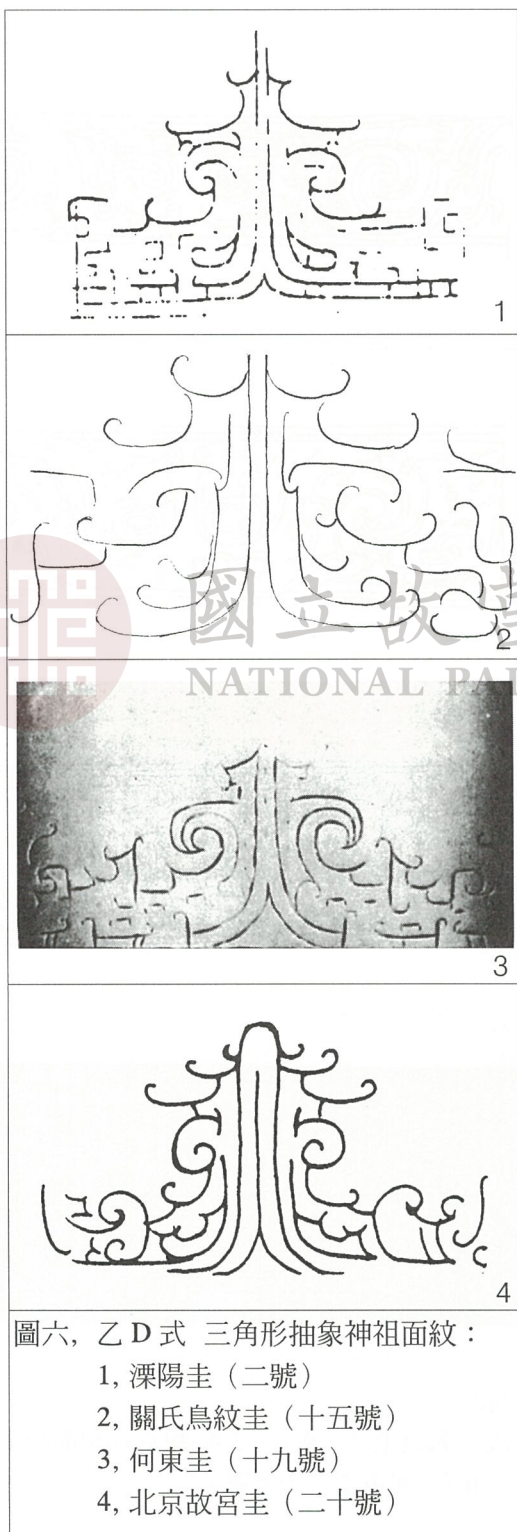


圖五，乙 C 式 長帶狀抽象神祖面紋：

- 1, 兩城鎮圭（一號） 2, 故宮鷹紋圭（十號） 3,4, 故宮神祖面紋圭（九號）
5, 北京故宮圭（二十號） 6,7, 何東圭（十九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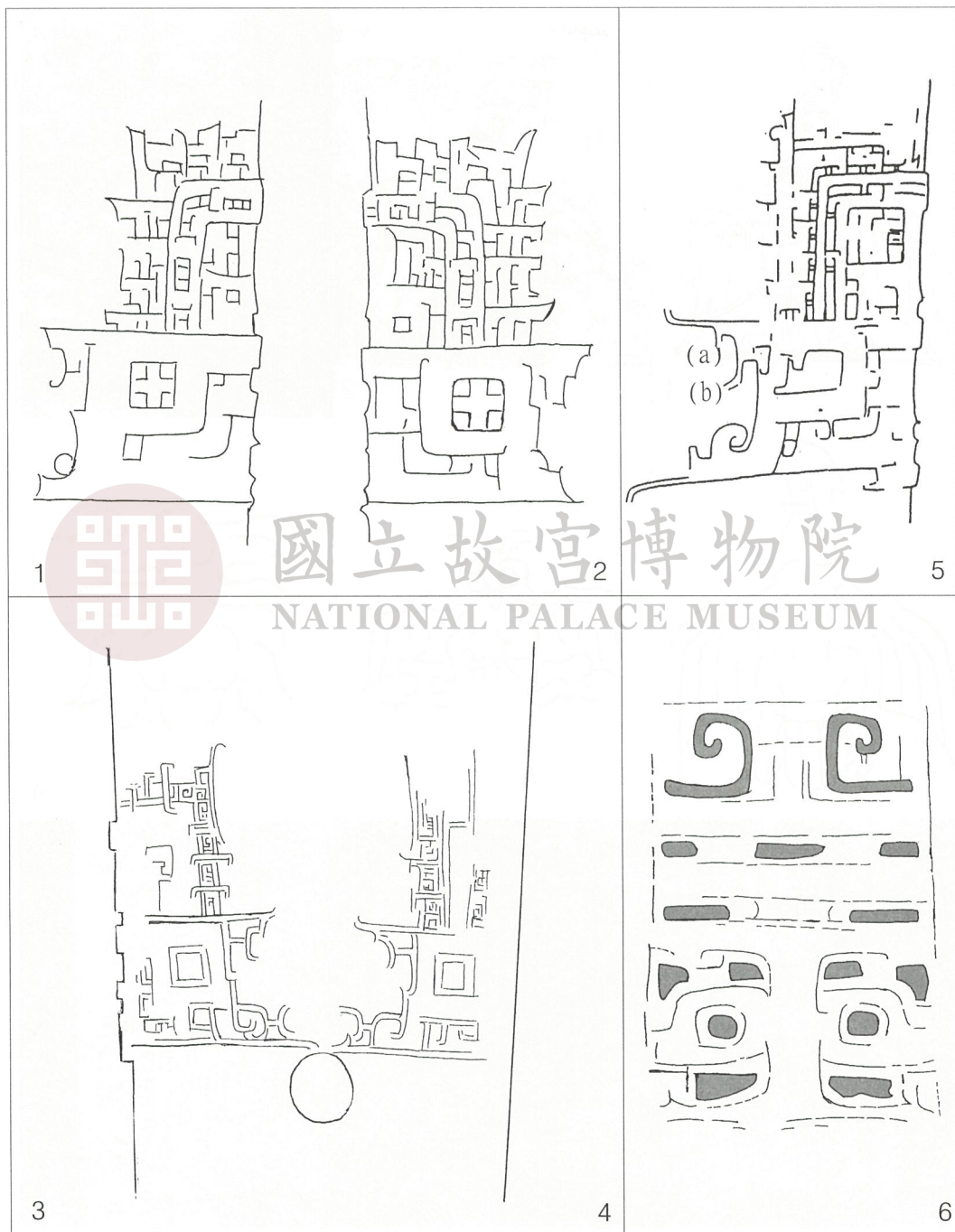
軸，多由一或二條直紋為花紋的中心，左右方以勾連的圓弧線，裝飾出高度抽象的有高冠與大眼的面紋。

丙式，幾何化神祖面紋。（圖七）與前述花紋最大的不同是，丙式花紋多是以器緣的淺齒稜為中心，向左右（其實就是在一片的兩面），用輕淺的橫橫直直的短線，雕琢出幾何化的面紋。若是將兩面的，各半個面紋拼合起來，就是一個完整的面紋。這種面紋仍保存乙式的基本成分，但細部除保留少數勾連的圓弧線外，大部分都發展成短的平直線。大眼已簡化，或作四方形（七：3、4），或在四方形中加飾雙勾的十字紋（七：1、2），或略作變化成底邊較長的變化型（七：5）。面紋上方有一大片飾以橫直交錯短直線的圖案，可能是表達神祖所戴的高大羽冠。圖七：6 關氏鏤空面紋圭是一個變例，它不以器緣為面紋的中心，而將整個面紋鋪陳於器表，且以鏤空加線雕的方式表現。此外，必須要指出的是，與大部分雕紋玉圭不同處為，關氏玉圭必須將刃部向下，花紋才是正的。



圖六，乙D式 三角形抽象神祖面紋：

- 1, 溧陽圭（二號）
- 2, 關氏鳥紋圭（十五號）
- 3, 何東圭（十九號）
- 4, 北京故宮圭（二十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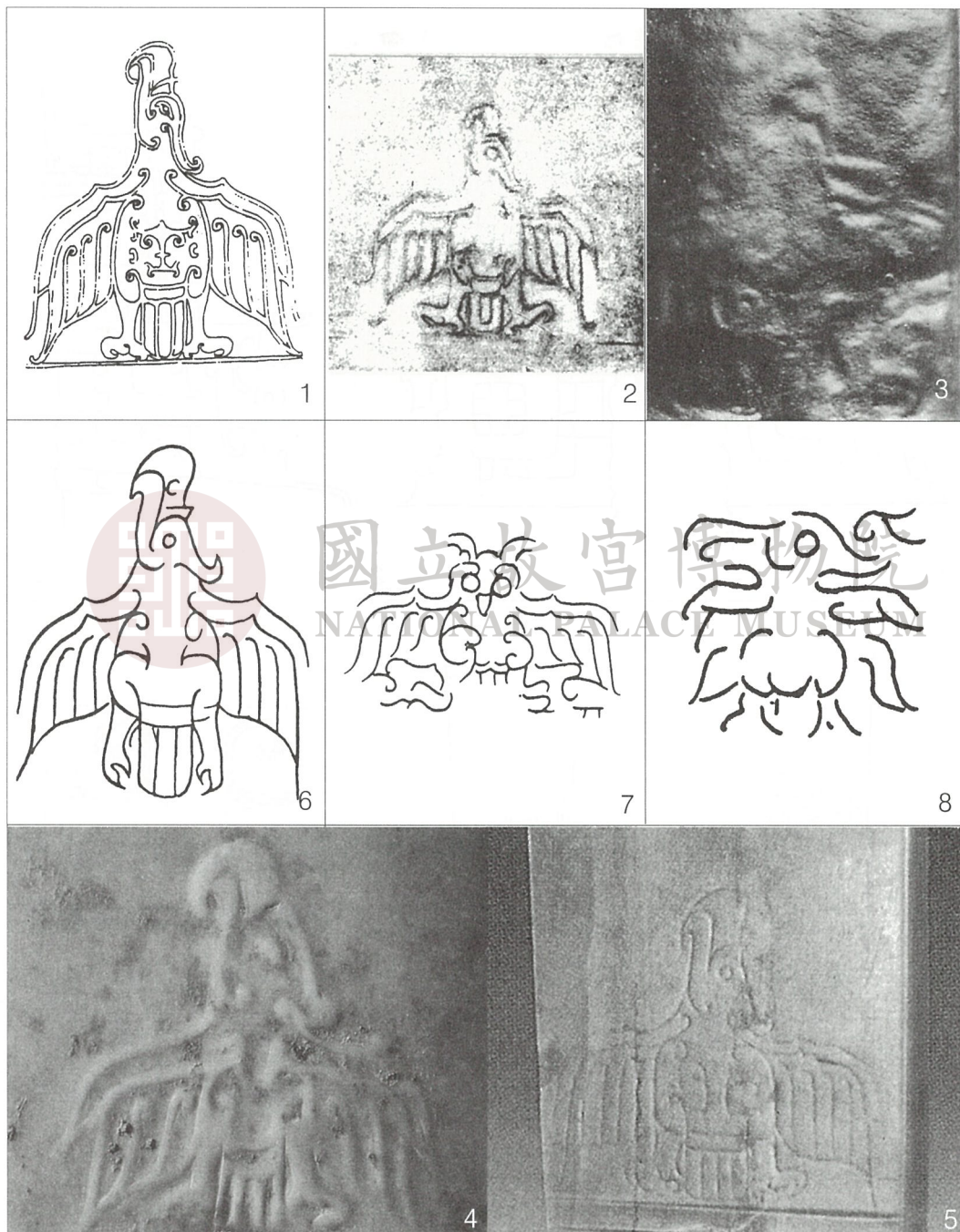
圖七，丙式 幾何化神祖面紋：

1,2, 黎城戚（三號）

3, 沙可樂刀（二十七號）

4,5, 聖路易戚（二十四號）

6, 關氏鏤空面紋圭（十八號）



圖八，丁A式鷹鳥紋：

- | | | |
|----------------|--------------|---------------|
| 1, 故宮鷹紋圭 (十號) | 2, 上海圭 (十二號) | 3, 弗利爾圭 (十一號) |
| 4, 藍田圭 (十三號) | 5, 天津圭 (十四號) | 6, 侯馬圭 (四號) |
| 7, 關氏鳥紋圭 (十五號) | 8, 溧陽圭 (二號) | |

丁A式，鷹鳥紋。（圖八）多作正面向上衝飛形。全形的外輪廓，相似於「介」字形，有違鷹鳥的自然形象。這種花紋多在器表的主要部位，只有圖八：8琢於主體花紋下方的飾帶中。大部分鷹鳥的頭部都向右轉，只有圖八：7的鷹頭正視前方。

丁B式，鳳鳥紋。（圖九）常只以飄逸的長鳳羽，表達鳳鳥的意念。多插於神祖面像左右橫出的牛角形裝飾的上方。有時也表現側身回首的不完全形像。如圖九：4。

戊A式，帶條班虎紋。（圖十）頗為寫實，仔細雕出尖銳的虎爪與虎皮上的條班紋，但眼睛輪廓作橄欖形，中央有圓眼珠。這種在抽象或寫實的動物頭上，裝飾似人眼般的眼睛，正是銅石並用期至二里頭文化期（夏代）宗教藝術品的特色之一。值得注意的是，從虎的臉頰至虎頸處，有數條向上豎起的直線，似為一些支柱，在其上方頂著寬大的神冠。

戊B式，無條班虎紋。（圖十一）較為寫意，值得注意的是，虎鼻上凸出一似為神冠之物，自軀幹中段向上凸出二支柱，頂著一條似火焰般的長飾帶。飾帶的下方為一順著虎背曲線起伏的細線，而上方的凹凸紋，曾經林已奈夫先生分析，稱之為「三段鉏牙」，以為是「氣」的象徵【註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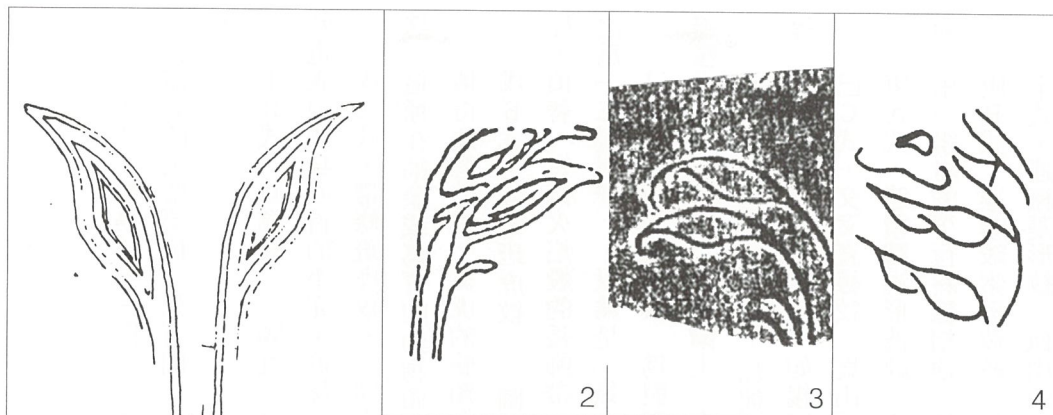
己A式，橫條直線紋。為與刃線平行的直線紋，多為淺凸線，也有時為細陰線。多琢於主體花紋下方的長方飾帶的上下邊緣處，如侯馬圭、弗利爾圭、上海圭、天津圭等，也有作為主體花紋的，如二里頭弦紋圭。（圖十二）

己B式，直條直線紋。為與刃線垂直的直線紋，可為淺凸線或細陰線。多琢於主體花紋下方的長方飾帶中，如何東圭等。也有作為主體花紋的，如楊家埠圭、養德堂弦紋圭等。（圖十三）

己C式，交叉直線紋。為由兩組平行細陰線，交叉組合成的格子紋。（圖十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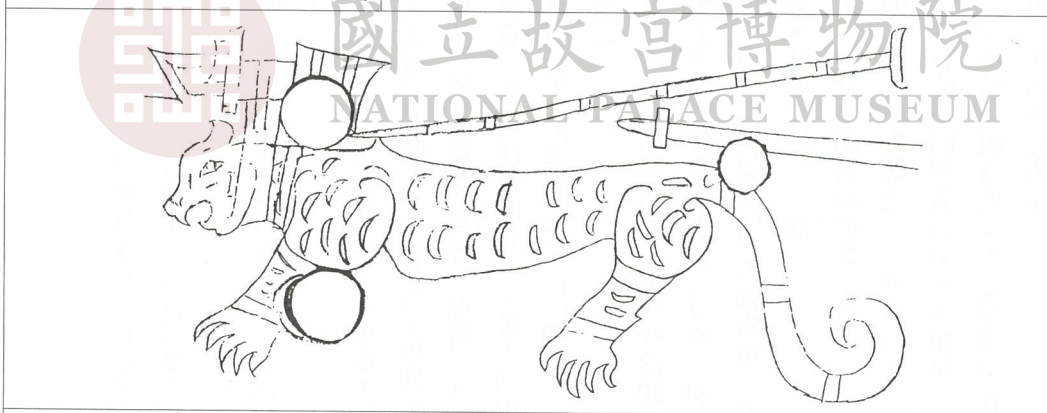
庚A式，連續圓渦形波紋。初看似旋轉的波濤，仔細觀之，又略有變化。有的似為平行並列的圓轉漩渦紋，每個漩渦之間，用一組組的平行斜線相連，如圖十五：一，有的則圓轉漩渦緊密連續排列，如圖十五：二。

庚B式，連續絞索形波紋。以連續兩組寬帶波紋，組成似交纏之繩索的花紋。（圖十六）
辛式，連續菱形紋。似由前一式發展而來，如圖十七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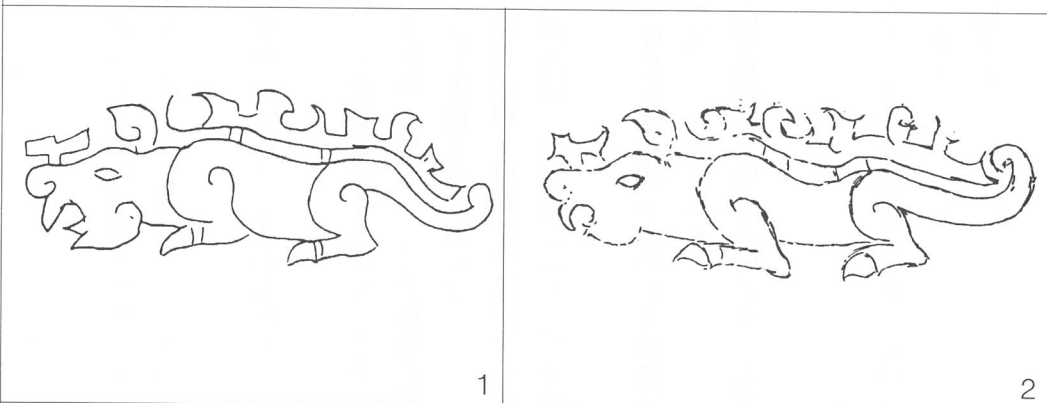


圖九, 丁 B 式 鳳羽紋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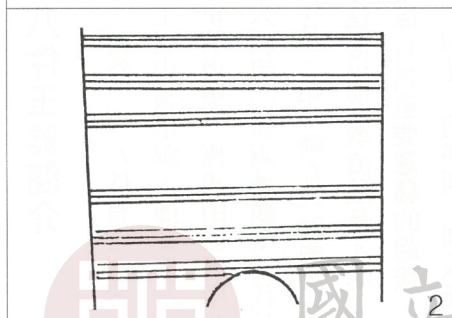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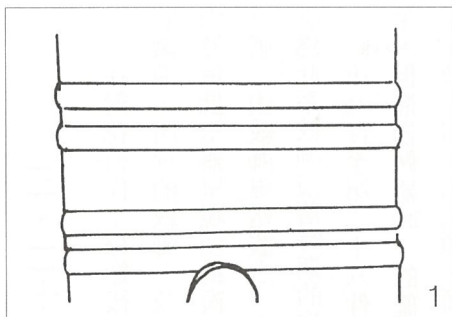
- 1, 故宮鷹紋圭 (十號) 2, 弗利爾刀 (二十六號)
3, 上海刀 (二十五號) 4, 溧陽圭 (二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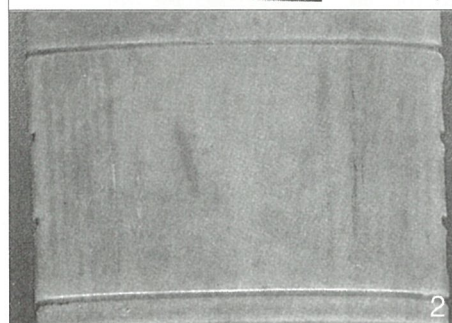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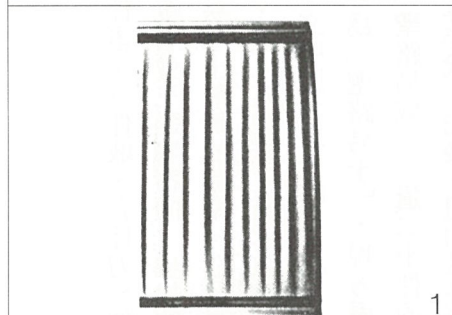
圖十, 戊 A 式 帶條班虎紋 : 1, 養德堂虎紋圭 (二十二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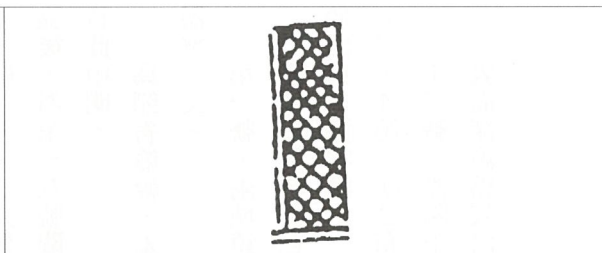
圖十一, 戊 B 式 無條班虎紋 : 1, 2, 弗利爾刀 (二十六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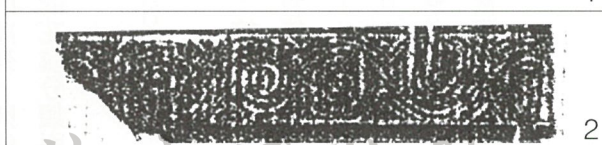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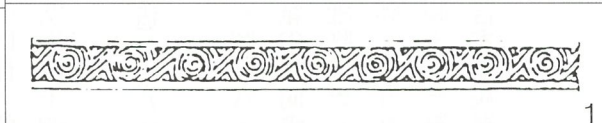
圖十二, 己 A 式 橫條直線紋:
1, 二里頭弦紋圭 (七號)
2, 侯馬圭 (四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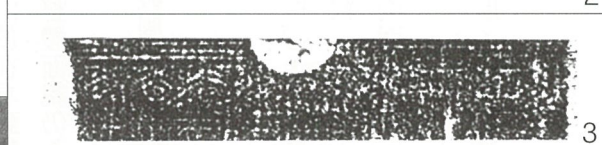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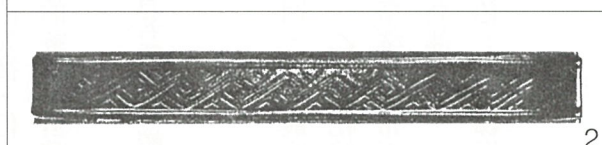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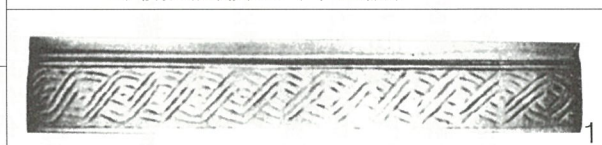
圖十三, 己 B 式 直條直線紋:
1, 何東圭 (十九號)
2, 養德堂弦紋圭 (二十一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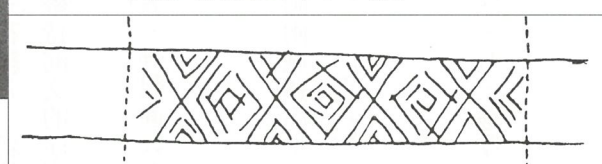
圖十四, 己 C 式 交叉直線紋: 溧陽圭 (二號)



圖十五, 庚 A 式 連續圓渦形波紋:
1, 故宮神祖面紋圭 (九號)
2, 關氏鳥紋圭 (十五號)



圖十六, 庚 B 式 連續絞索形波紋:
1, 何東圭 (十九號)
2, 北京故宮圭 (二十號)
3, 關氏鳥紋圭 (十五號)



圖十七, 辛式 連續菱形紋: 二里頭菱形紋圭 (八號)

三、二十八件玉器簡介

在對花紋作了分類後，擬將二十八件有刃玉器（包括二十件圭、三件戚、五件刀）的色澤、基本形制、尺寸、出土地、收藏地、所琢的紋飾、及主要出版情況，擇要簡述如下。凡是筆者曾見過實物的，也加註明，以示對該器色澤的描述負責。由於這批玉器呈現極為複雜的現象，無論由器形或花紋，都不易理出清晰的脈絡。在此先將八件出土或徵集的，暫列為一至八號。由紋飾風格觀之，大約第一號兩城鎮圭時代較早，第六、七、八號圭，僅琢弦紋，七、八號兩件，出於二里頭遺址，應為此系紋飾沒落時期的作品。第三號在〈神祖面紋有刃器〉一文中原名為「山西戚」，現為統一體例，改名為「黎城戚」。

第九件至第二十八件為傳世器或流散品。第二十四號原名為「聖路易圭」，現考慮它的齒稜雖淺，且一邊齒稜還被磨平，但最初做器時，的確琢有具重要意義的齒稜，故更名為「聖路易戚」。這二十件的排列順序為，先依器形大致分為：圭、戚、刀、三大類。而十四件圭的序列，則依風格所呈現雕琢年代的先後。但由於在看到黎城戚，對丙式花紋有了新的認識後，對第十八號關氏鏤空面紋圭的花紋分類與置放方向，有了不同的解釋，但整體面貌仍不清楚，故仍維持前文的序列。特此申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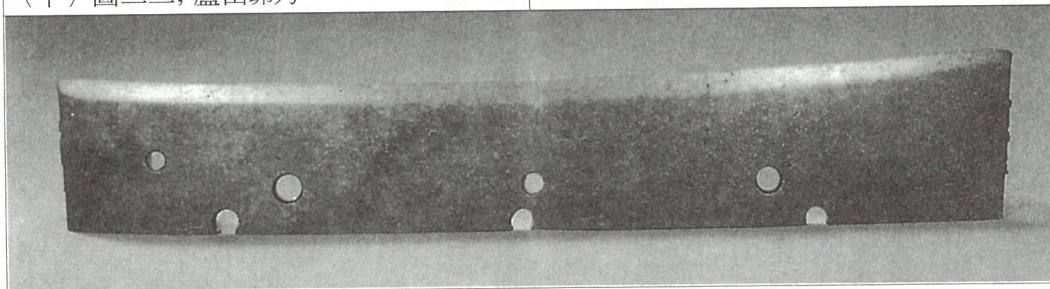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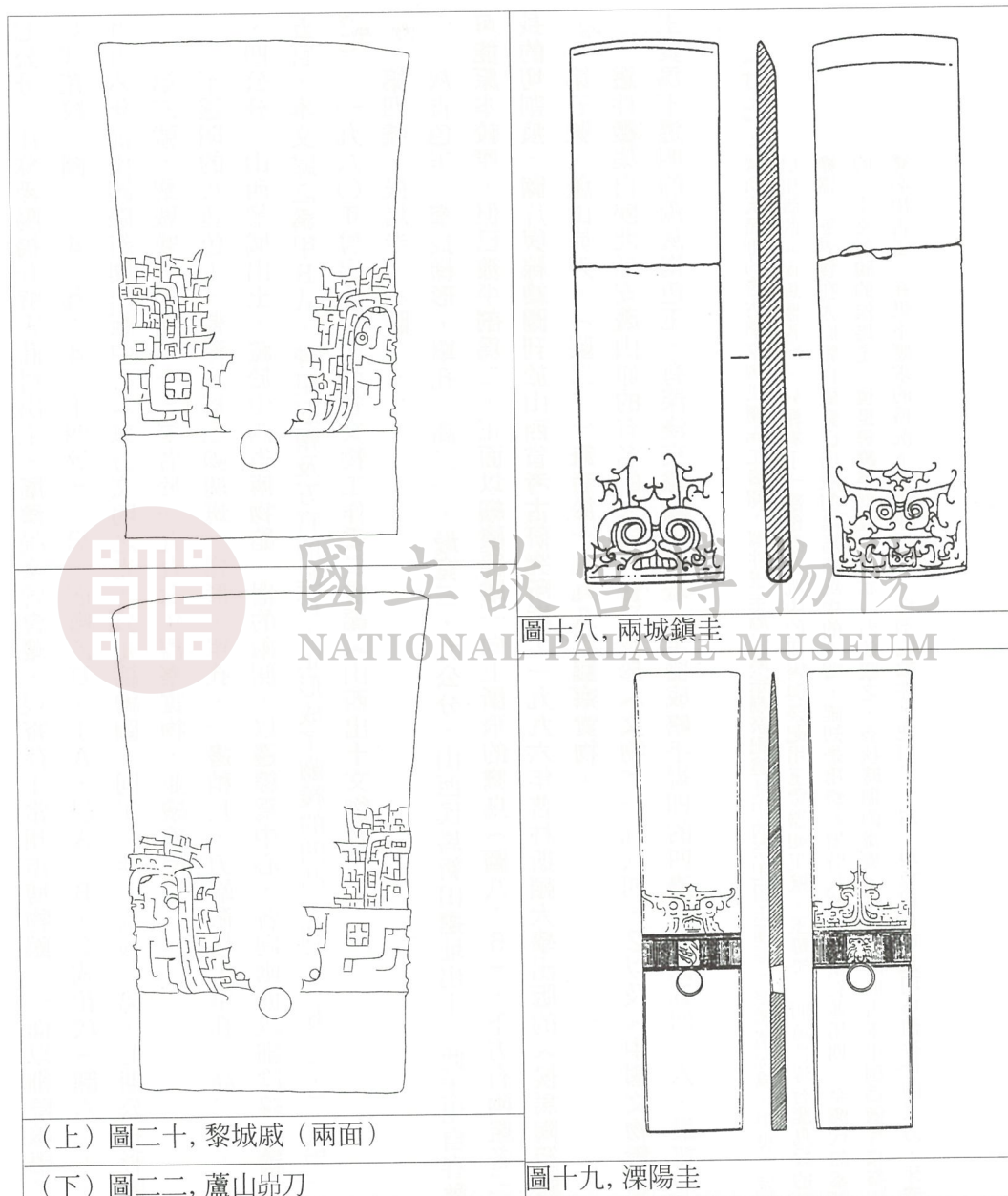
為節省篇幅，本文對這二十八件有刃玉器，只做基本描述，讀者若欲獲得較周詳的資料，請參考拙著〈神祖面紋有刃器〉一文。

第一號，兩城鎮圭。（圖十八）筆者於一九九六年觀察實物。

不透明的牙黃色，夾雜半透明青綠色。窄長梯形。高一八，最寬四·九，最厚〇·八五公分。山東日照兩城鎮出土，藏於山東省博物館。一面以細陰線雕乙A式（圖三：1），另面雕乙B、乙C式花紋（圖四：1、圖五：1）。《考古》一九七二·4第一次公布線繪圖。一九九六年山東美術出版社《山東文物精華》公布兩面的彩圖。

第二號，溧陽圭。（圖十九）筆者於一九九六年觀察實物，並繪局部線圖。

表面深沁為灰白色，含零星灰褐斑點，僅兩側保留原來的鴨蛋青色。窄長梯形，單孔。高二一，最寬四·八，最厚〇·



七公分。江蘇溧陽楊莊鄉宋莊村出土。屬溧陽文管會藏，現寄存于常州市博物館。一面以細陰線雕乙A、丁B、己A、B、C式花紋（圖三：4、九：4、十四等），另一面雕乙D、丁A、己A、B、C式花紋（圖六：1、八：8、十四等）。一九九六年海南國際新聞出版中心《東方文明之光》公布線繪圖，同年《紫玉金砂》第三七期公布彩圖。

第三號，黎城戚。（圖二十）筆者於一九九七年觀察實物，並繪線圖。

不透明的灰黃色玉，帶深淺褐色團塊斑。梯形，單孔，一邊稍長，刃端微侈，單孔。高二〇·七、最寬一三·一、厚〇·四公分。山西黎城出土，藏於山西省博物館。器的兩側，以邊線為中心，各向兩面以細陰線刻繪神祖面紋。一組有具象的五官，本文歸之為甲B式，神祖冠帽及五官的起伏，正形成了齒稜的凹凸（圖二：6、7）。另一組為丙式（圖七：1、2）。一九八〇年曾出版於山西省文物工作委員會編《山西出土文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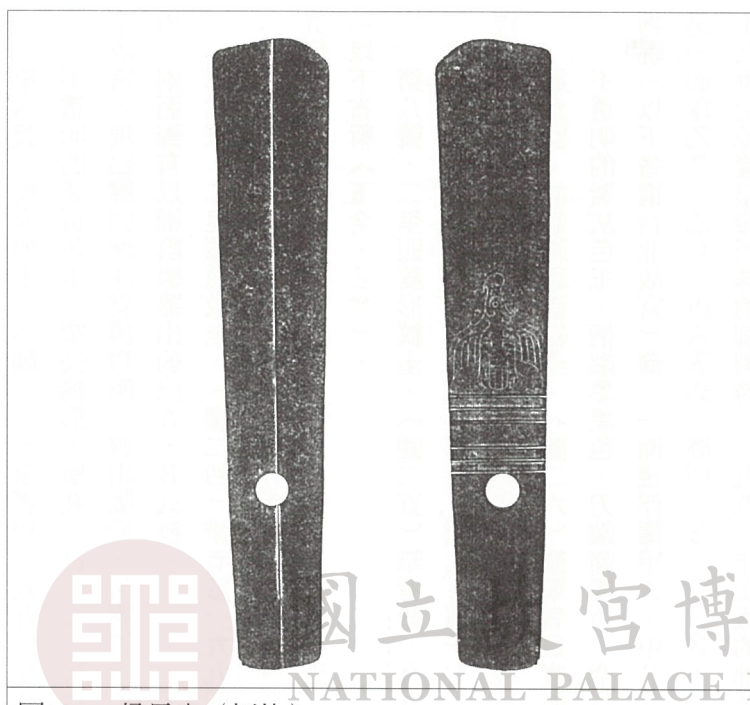
第四號，侯馬圭。（圖二一）

灰青色玉。窄長梯形，單孔。高二一，最寬三·九公分。山西侯馬新田遺址出土。此圭出自春秋時期祭祀坑【註七】，可能原本較厚，但已被平剖為二，正面以細陰線雕一向上衝飛的鷹鳥（圖八：6），下方有兩組各三條弦紋。背面有一直而長的切割痕。圖片與線繪圖刊於山西省考古研究所編，一九九六年普林斯頓大學出版的《侯馬陶範藝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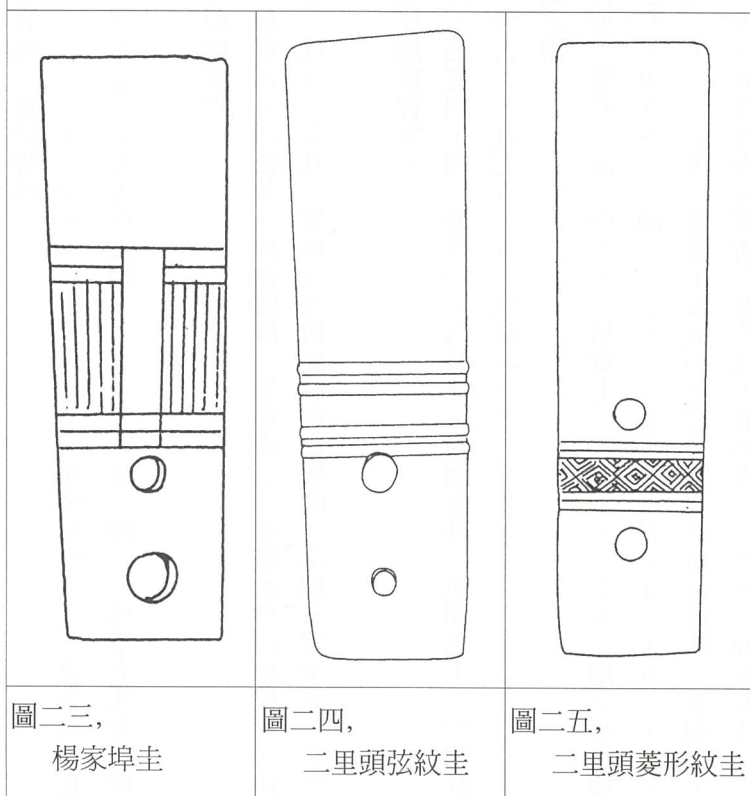
第五號，蘆山崩刀。（圖二二）筆者於一九九八年觀察實物。

這件徵集自陝北延安蘆山崩的有名的大刀，曾發表於《文物》一九八四·2以及《中國文物精華一九九二》等書中。其玉質為不透明的深灰褐色玉，有深淺交雜的團塊斑。全器成略不規則的四邊形。長五四·六，最寬一〇，厚〇·四公分。刀

【註七】：據負責發掘的考古學家陶正剛先生告知，這件玉圭屬侯馬宗廟祭祀遺址中的祭祀用玉禮器。整體情況為，中央一宗廟遺址，周圍有七組祭祀坑。已出版的《侯馬盟書》，只報導了一部份祭祀坑中的盟書與祭祀用玉禮器如玉璧、玉璋等。而這件琢有鷹鳥紋的玉圭，屬未發表的祭祀坑中玉禮器。筆者曾在太原親自觀察已出版的侯馬祭坑中的玉璧，確知是用新石器時代晚期（銅石並用期）至商代的素璧，平剖成極薄的片狀來使用的。本文討論的侯馬圭，也是曾經平剖成薄片狀。由此觀之，春秋時期的貴族，常將當時的古玉平剖為數片來祭祀神明。這或許是因為某些祭禮必用古玉，在供不應求的情況下，就只好將一件剖成數件來使用了。這一現象或也可說明為何存世的玉刀、牙璋，常被剖為數片之故。



圖二一，侯馬圭（拓片）



刃微向內凹，刀背平直，鑲鑿了兩排各三個圓穿，外沿的一排圓穿，都已被刀背邊緣破壞，可知此器在製作過程中，或曾改工。左右兩側邊雖厚度相似但寬度不同，且較窄的一端，還鑲有一小圓穿，意味著窄端即為柄端。一九九八年春筆者於陝西省歷史博物館親自觀察實物時，才發現在其柄端的齒稜，居然是一個神祖的側面像。凹凸有緻的淺齒稜正表現了神祖的帽、額、鼻、嘴、頰、頸的起伏（圖二：14）。

第六號，楊家埠圭。（圖二三）筆者於一九九〇年觀察實物，並繪線圖。

不透明的牙黃色玉。窄長梯形，雙孔。高一·九，最寬六·二，最厚一公分。浙江吳興龍溪公社楊家埠出土。曾典藏於北京故宮，現已歸回浙江省博物館。曾出版於《文物》一九八四·二〇，《考古與文物》一九八五·五。圖二三為筆者據實物所繪。兩面飾有以細陰線雕出的己A、B式紋。

第七號，二里頭弦紋圭。（圖二四）筆者於一九九四年觀察實物。

表面已沁為雞骨白色。窄長梯形，雙孔。高二·一，最寬六·四公分。河南偃師二里頭出土。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藏。淺浮雕己A式花紋。出版於《考古》一九七五·五，以及一九九三年河北美術出版社出版的《中國玉器全集·2》（以下省稱《玉全·2》）。

第八號，二里頭菱形紋圭。（圖二五）筆者於一九九七年觀察實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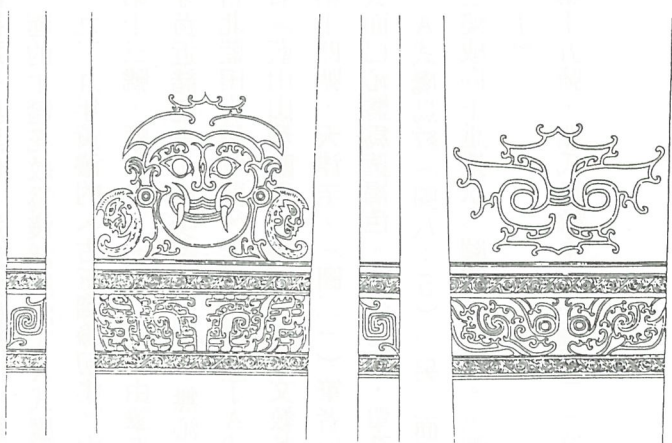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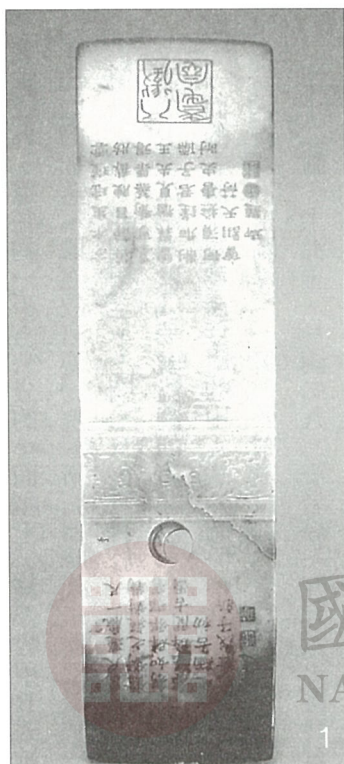
牙黃色，局部有銅綠沁。窄長梯形，雙孔。高一·七，四，最寬四·四，最厚〇·八公分。河南偃師二里頭出土。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藏。淺浮雕己A與辛式花紋。出版於《考古》一九七五·五，以及《玉全·2》。

第九號，故宮神祖面紋圭。（圖二六）屬筆者負責典藏之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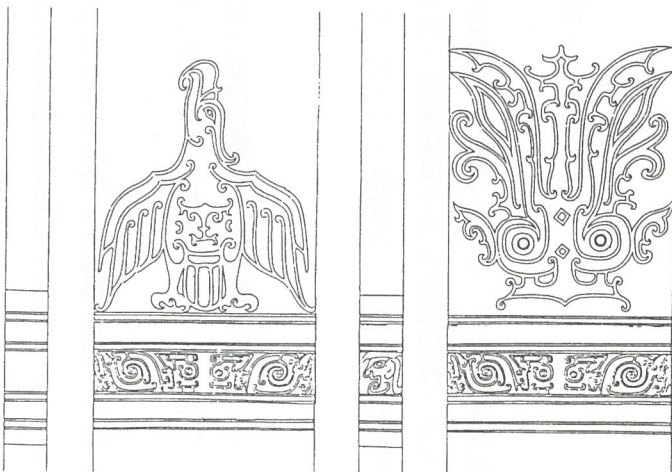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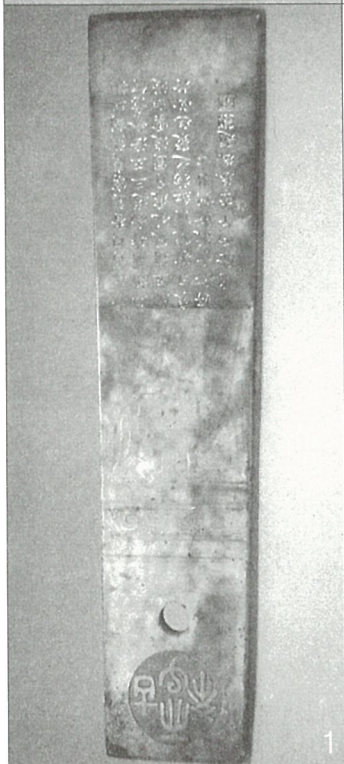
不透明的黃灰色玉，柄端墨黑色，刃端赭褐色。窄長梯形，雙孔。高二·四·六，最寬七，最厚一·二公分。國立故宮博物院（以下省稱台北故宮）藏。一面淺浮雕甲A、甲B、乙C、庚A等式（圖一：1，2：9、二〇，五：4，十五：1），另一面琢乙B、乙C、庚A等式（圖四：2，五：3，十五：1）。窄邊上還雕了類似的花紋。除了前述花紋外，還加雕了十八世紀乾隆皇帝所詠的御製詩。一九九二年出版的拙著《國立故宮博物院藏新石器時代玉器圖錄》一書中，圖版較佳。

第十號，故宮鷹紋圭。（圖二七）屬筆者負責者典藏之物。

一面為不透明的牙黃泛灰色玉，局部赭紅；另一面則灰黃部分較少，赭紅面積較大，刃部墨黑色。窄長梯形，單孔。高三〇·五，最寬七·二，最厚一·〇五公分。台北故宮藏。一面淺浮雕丁A、乙C、己A等式（圖八：1，五：2等），另一面琢乙B、乙C、己A等式（圖四：3，五：2等），值得注意的是，兩個窄邊上也雕有花紋，一為己A式，另一窄邊除



國立故宮博物院
圖二六，1，故宮神祖面紋圭
（爲配合花紋方向，故本圖刃端向上）
2，故宮神祖面紋圭四面的花紋（刃端向上）



圖二七，1，故宮鷹紋圭
（爲配合花紋方向，故本圖刃端向上）
2，故宮鷹紋圭四面的花紋（刃端向上）

了直線紋外，還在約一平方公分的小面積上，淺浮雕甲B式神祖像（圖二：8）。器表也加雕了乾隆皇帝的御製詩。一九九二年出版的拙著《國立故宮博物院藏新石器時代玉器圖錄》一書中，圖版較佳。

第十一號，弗利爾圭。（圖二八）筆者於一九八〇、一九九二年觀察實物。

通體曾經深沁熟盤成美麗溫潤的赭紅色。窄長方形，單孔。高一八·五，寬僅三·六公分。藏於美國華盛頓弗利爾博物館。一面的主體花紋為淺浮雕的甲A式（圖一：2），另一面丁A式（圖八：3）。下方還有己A式直線紋，一九四五年梅原末治《支那古玉圖錄》一書中公布黑白圖。

第十二號，上海圭。（圖二九）筆者於一九九六年觀察實物。

深褐近乎墨黑色。近似長梯形，一邊稍長，刃線微呈斜圓弧刃，單孔。目測高約二〇，寬約七·八公分。上海博物館藏。一面的主體花紋為淺浮雕的丁A式鷹鳥（圖八：2），另面為乙B式抽象神祖面（圖四：4）。下方還有己A式直線紋。一九三九年黃濬的《古玉圖錄初集》中，發表拓片。彩圖見一九九六年出版的《上海博物館·中國古代玉器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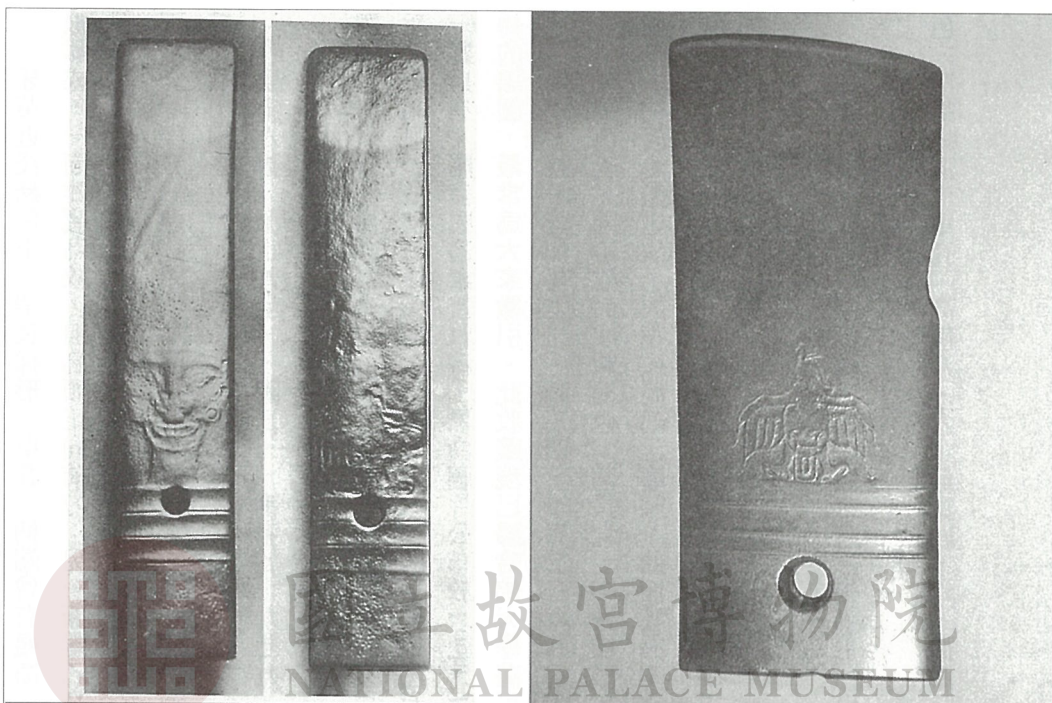
第十三號，藍田圭。（圖三十）由筆者觀察並發表。

牙黃近赭色玉，有少許灰黑點。無沁斑。窄長梯形，雙孔，其一填有松綠石片。高一四，最寬四·四，最厚〇·五公分。台北藍田山房收藏。一面淺浮雕丁A式鷹鳥紋（圖八：4），另一面淺浮雕乙B式面紋（圖四：5）。一九九五年公布於拙著《藍田山房藏玉百選》，年喜文教基金會出版。

第十四號，天津圭。（圖三一）筆者於一九九七年觀察實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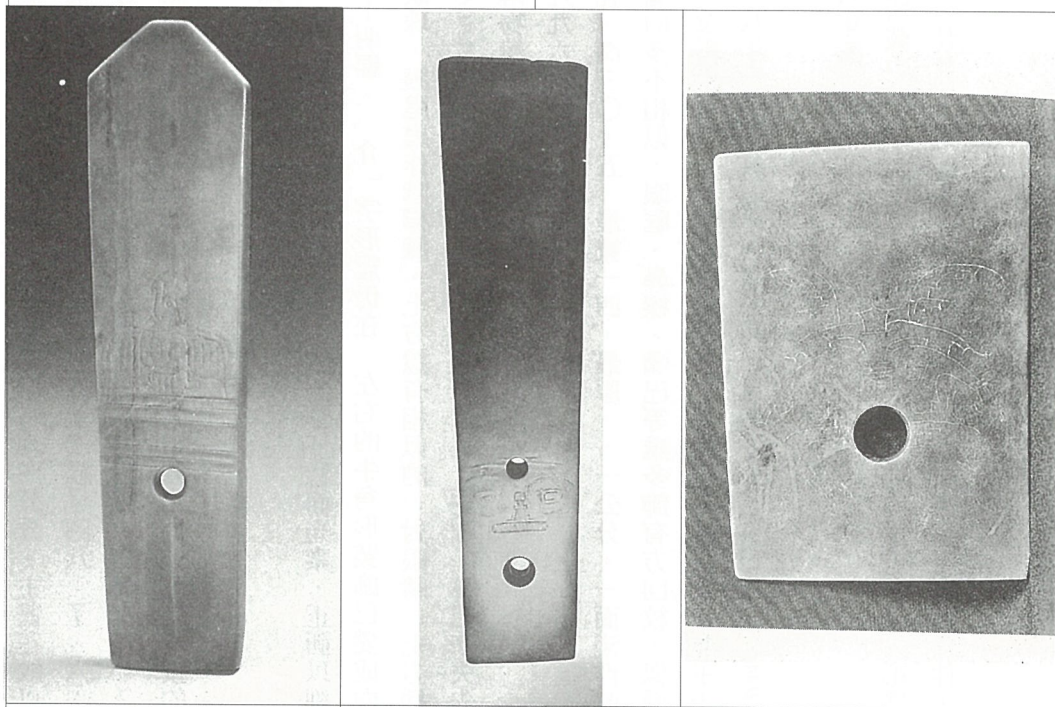
表面已沁盤為黃褐色。窄長梯形，單孔。刃部兩側曾被銷切。高二五·二，最寬六·二公分。主體花紋一面為細陰線刻繪的丁A式鷹鳥紋（圖八：5），另一面為乙B式大眼無口抽象面紋，但其兩側牛角式裝飾線紋，及大眼外圍繞的迴轉線條，已變成向下垂捲狀（圖四：6）。主體花紋的下方，為己A式直線紋。出版於一九九二年河北美術出版社的《中國玉器全集·1》。

第十五號，關氏鳥紋圭。（圖三二）筆者於一九九六年觀察實物，並繪線圖。



圖二八，弗利爾圭

圖二九，上海圭



圖三一，天津圭

圖三四，芝加哥圭

圖三三，溫索普圭

牙黃近淺赭色玉。窄長梯形，單孔。柄端曾有殘斷，殘長一三·九，最寬五·六，最厚〇·六四公分。主體花紋以細陰線雕成，一面雕鷹鳥紋，但鳥頭正向前方；另一面雕乙D式抽象神祖面紋，線條頗為草率。以上二紋見圖八：7、六：3，為筆者據實物所繪。主體花紋下方，為三條窄飾帶組成的長方飾帶。中央一條琢庚A式連續圓渦形波紋。（圖十五：2）上下兩條琢庚B式連續絞索形波紋。（圖十六：3）屬香港收藏家關善明先生藏品。一九九四年公布於楊伯達先生所撰的《關氏所藏中國古玉》。

第十六號，溫索普圭。（圖三三）筆者於一九七九、一九九二年觀察實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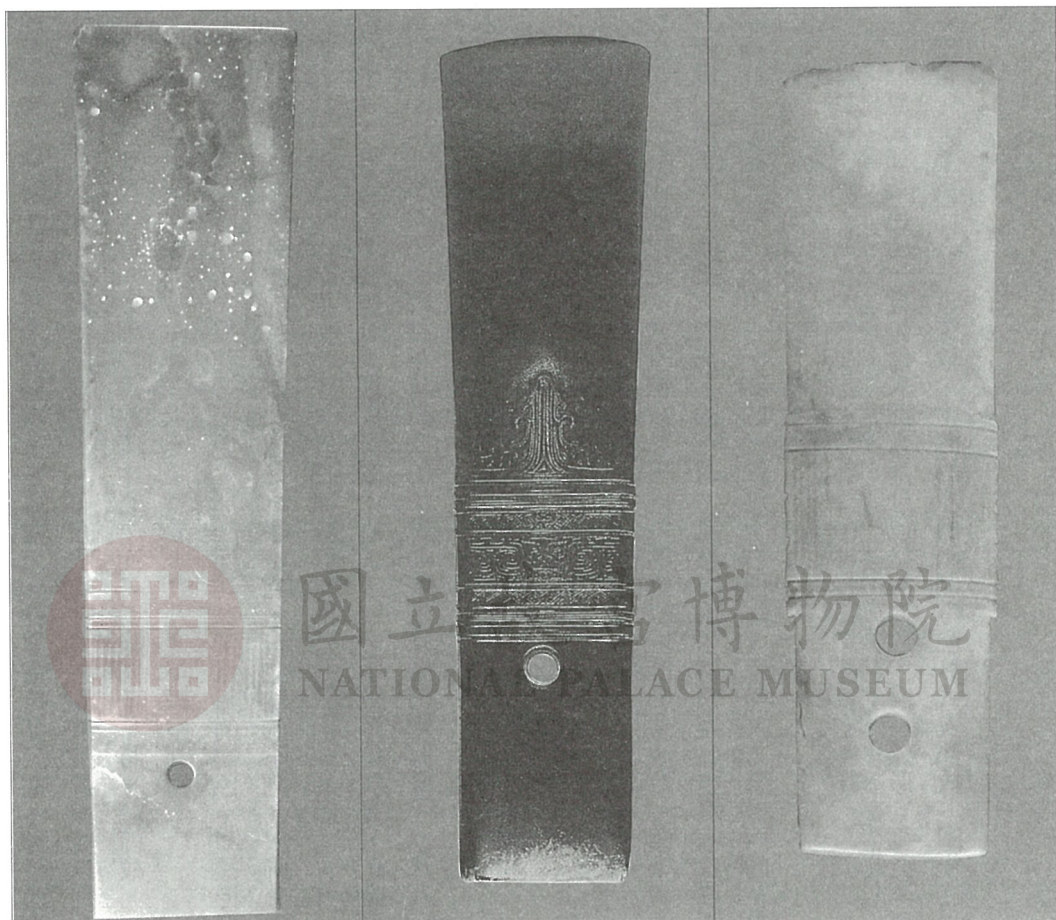
半透明的黃綠玉，瑩秀溫潤。短寬梯形，單孔。高二·七，最寬九·五，最厚〇·四公分。背面光素，正面以細陰線雕繪乙A式抽象神祖面紋（圖三：5）。雖也雕出口部，但不明顯。「介」字形冠仍在，左右的牛角形裝飾已變成向下彎垂，眼睛發展成前方後尖形，但眼眶為柔美的弧線，內有圓眼珠，眼尾處作階梯狀。上方還有相似的一對眼睛，上方插飾了一對長羽。屬美國溫索普收藏，黑白圖片公布於Loehr, Max, *Ancient Chinese Jades*, Fogg Art Museum, 1975。林巳奈夫先生所繪的線圖，最常為大家徵引。此收藏現已歸哈佛大學薩可樂博物館所有。

第十七號，芝加哥圭。（圖三四）筆者於一九八〇、一九九六年觀察實物。

牙黃色玉，因沁盤而成黃褐色。甚長大，窄長梯形，雙孔。高三〇·五，最寬一四，最厚一·一公分。一面淺浮雕抽象面紋，或因沁盤之故，故花紋局部已磨蝕。此面紋與本文討論的多不相似，眼眶、鼻樑、嘴巴等處多飾有方回紋，似受到良渚文化影響。但其眼睛的中央部位為略呈內方外尖的四方形，又與圖三：5等的眼紋頗相似，故暫列入乙A式。此玉圭屬芝加哥美術館的桑納修收藏（Sonenschein Collection），一九三八年為薩爾莫尼第一次公布。見Salmony, Alfred, *Carved Jades of Ancient China*, Berkeley. 1938.

第十八號，關氏鏤空面紋圭。（圖三五）筆者於一九九六年觀察實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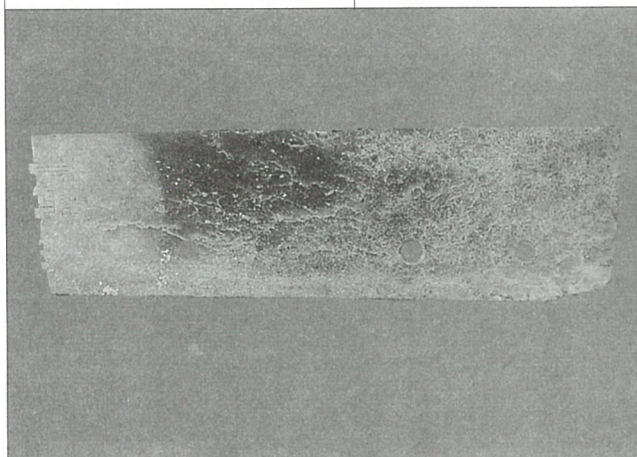
這件屬香港關善明先生收藏，一九九四年公布於《關氏所藏中國古玉》中，其質為勻淨的青綠色玉，大部分沁為灰白色。窄長梯形，單孔，高僅八·六，最寬四·六，最厚〇·三五公分。刃部曾被切鋸再磨平，原器或更長。雖然這件玉圭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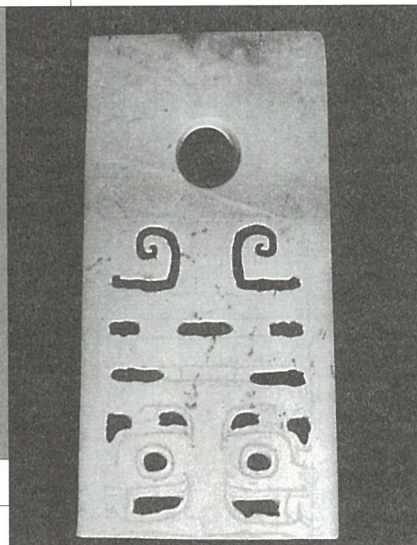
圖三六，何東圭

圖三七，北京故宮圭

圖三八，養德堂弦紋圭



圖四五，辛格刀（依禮制，刃端向上）



圖三五，關氏鏤空面紋圭（依花紋方向，刃端向下）

紋飾特殊且難解，但據筆者的觀察，它確實是一件上古珍品。在〈神祖面紋有刃器〉一文中我釋其刃部朝上，所雕為變體的乙A式花紋，「介」形冠頂已被切去。但在我前往太原觀察了黎城戚以後，改變前述的看法，而認為這件圭上所雕，或許是丙式花紋的變體。但不以器緣為紋飾中心，而是刃線向下，將一個面紋，平鋪於圭面上。

第十九號，何東圭。（圖三六）筆者於一九九五年觀察實物。

一面為青黃綠色玉，局部帶褐色；另一面為深淺雜然的褐色。窄長梯形，單孔，甚長大，高三三，最寬八·二公分。兩面花紋相似，只有如長方飾帶中央部分的小地方，有些微的不同。紋飾分為上下兩節，但與前述的各玉圭不同處為，上節的主體花紋較簡率，所佔面積也不大，為陰線雕琢的乙D式面紋（圖六：3）。下節的長方飾帶發展得很繁富，又分為三個單位，上、下各為一窄條庚B式波紋（圖十六：1），中央單位較寬，正中央為乙C式面紋（圖五：6、7），兩旁雕已B式直線紋（圖十三：1）這件早年公布的流散品，現在屬何東收藏。一九九五年再度以彩色發表於Rawson, Jessica, *Chinese Jade from the Neolithic to the Qing*.

第二十號，北京故宮圭。（圖三七）筆者於一九九八年觀察實物。

墨黑色玉，僅在柄端有一小塊白色。窄長梯形，刃部微侈，單孔。高二一·八，最寬五·五公分。兩面花紋不同，但都以高難度的淺浮雕法完成。正面紋分上下兩節，上節為乙D式面紋（圖六：4）；下節的長方形飾帶極為誇張，分為五個平行單位：最外兩層為已A式直線紋，再向內的兩條為庚B式波紋（圖十六：2），最中央一條為乙C式面紋（圖五：5）。背面則只雕下節的飾帶，而無上節花紋。雖然有的學者懷疑此圭為清代偽古，表面的黑色是塗黑漆所致。但筆者觀察實物，認為此圭應是天然的墨玉。上節的面紋屬上古所雕。下節長方飾帶內的花紋，可能曾經清宮玉工，依據原有花紋再予加深，並將全器器表仔細拋光。

第二十一號，養德堂弦紋圭。（圖三八）由筆者觀察並發表。

原應為牙黃色玉，經沁盤表面大部分已呈淺褐色。窄長梯形，雙孔。高二二·四最寬六·四公分。器表近中段處浮雕一寬飾帶，上下為已A式直線紋，中間的器表兩側琢已B式直條紋（圖十三：2），中央保持光素。台北養德堂收藏。曾發表

于一九九五年拙作《群玉別藏》中。

第二十二號，養德堂虎紋圭。（圖三九：1、2）由筆者觀察並發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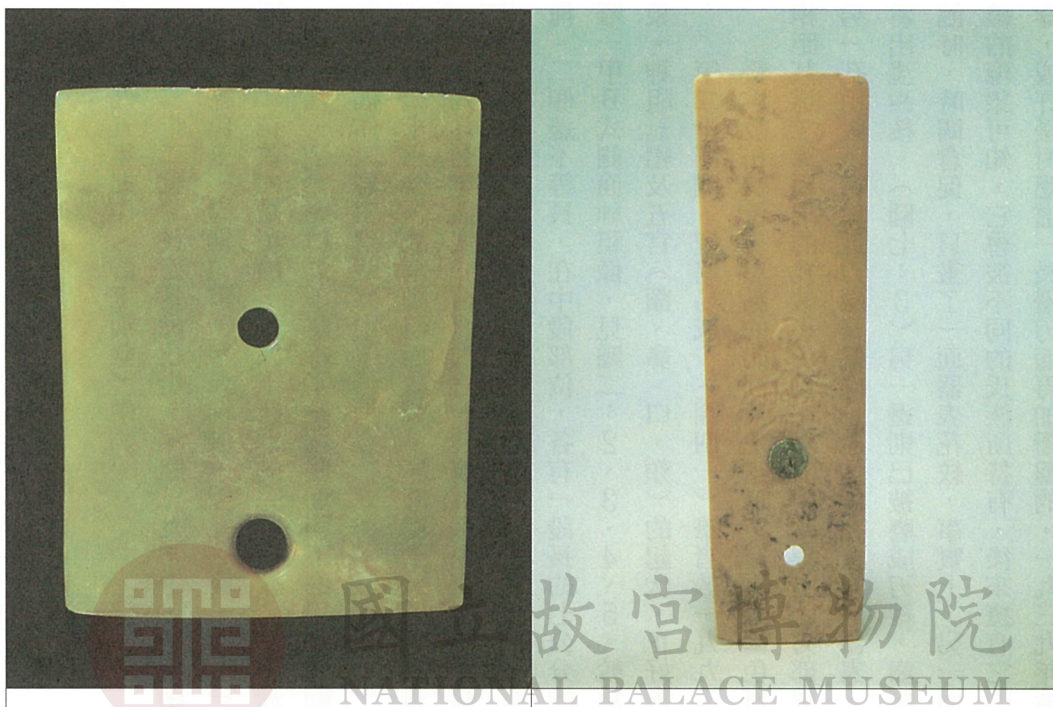
草綠色玉，尚稱勻淨。窄長梯形，雙孔。高一·七，最寬六·七五公分。這件玉圭上的花紋十分特別。必須將圭的刃部向下，花紋才是正的，如圖十所示的完整虎紋，佈局於器表兩面，即是由虎的腰部分開，前半身在正面，後半身在背面。（圖三九，2）虎口之下雕琢了一個臉面朝下的甲B式神祖頭像（圖二：13）。這件玉圭屬台北養德堂收藏。曾發表于一九九五年拙作《群玉別藏》中。

第二十三號，故宮神祖面紋戚。（圖四十）屬筆者負責典藏之物。

一九九七年入藏於台北故宮。其質為深淺交雜的黃褐夾青綠色玉，大部分沁為灰白。器呈短寬的四邊形，單孔。高二·三，四，刃端寬二·二，最厚〇·五公分。刃線微凹，有嚴重的使用傷缺痕。已斷為多塊，曾經鄉民粗糙的接補還有少數缺塊。二側邊不等長，在中段部位，各有一段長約七公分的齒稜，一側殘缺甚，又用現代材料接補。在近齒稜器表的兩面，各雕一甲B式側面神祖像，見圖二：2、3、4、5。較為特別的是，除了頭像外，還有簡單的身軀。一邊較具象，另一較抽象。神祖冠帽及五官（額、鼻、口、頰）的起伏，正好形成了齒稜的凹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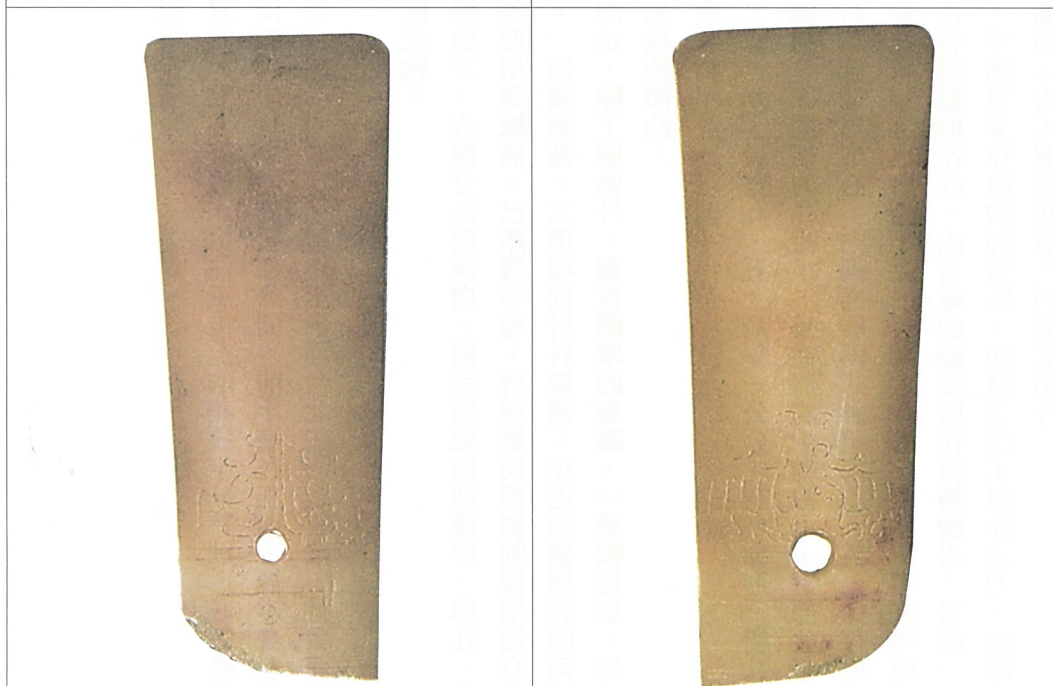
第二十四號，聖路易戚。（圖四一）筆者於一九九二年觀察實物，並繪線圖。

質為散布少量灰黑點的奶油黃色玉料，有長條褐色斑。高二·九，最寬九·五，最厚一公分。窄長梯形，雙孔。二孔相距甚遠，靠柄端的孔較小，且在器的中軸線上。刃部線並不鋒利。靠柄端的孔較小，且在器的中軸線上，刃部並不鋒利。另一孔稍大，較靠近刃端又偏向一邊。柄孔上方的器表，以左右二側邊為中心，向兩面雕丙式神祖面紋，其一保存原貌，可看出淺齒稜。（圖七：3）另一邊則已被磨成刃線，齒稜及一些花紋細部已磨損不見。（圖七：4）由於筆者在聖路易美術館時，時間倉促，只畫了一面器表花紋，事實上，另一面器表也有同樣的花紋。由器緣的齒稜與花紋被磨去，變成一新的刃線的現象可知，它曾被不同的氏族所持有，後來擁有它的氏族，不顧原來花紋的神聖性，而將之改工用作玉刀，而較大的圓穿，或許是對這一長邊刃而再加鑲鑿的。一九三九年黃濬所編的《古玉圖錄初集》刊有其拓片。



圖六〇，大孤堆圭

圖三〇，藍田圭



圖三二，關氏鳥紋圭（爲配合花紋方向，故本圖刃端向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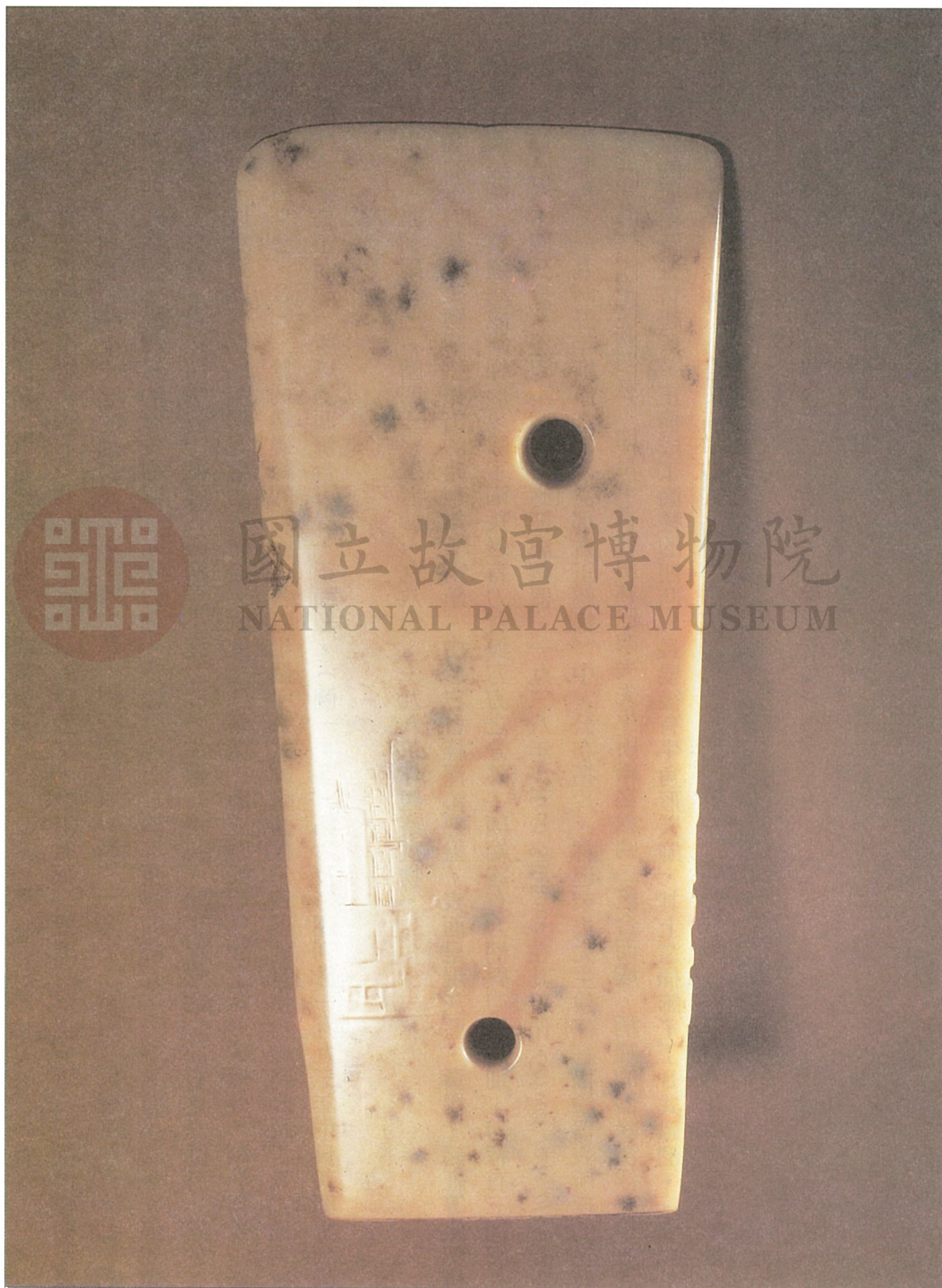
圖三九，2，養德堂虎紋圭兩面所刻的紋飾



圖四二，上海刀



圖四十，故宮神祖面紋戚（兩面）（此器有兩處殘缺，青色部分為現代材料接補）



圖四一，聖路易戚

第二十五號，上海刀。（圖四二）筆者於一九九六年觀察實物。

質爲草綠、墨綠夾雜褐色不透明玉。一九九三年時，筆者曾著文，說明這是一把華西系統，新石器時代晚期至夏代的大玉刀，被削短改工並加雕了華東文化的神祖像。【註八】在〈神祖面紋有刃器〉一文中，筆者又依據本件寬達七·七公分，參考華西玉刀的一般情況，推測它的原長約四、五十公分，背緣可能有三個等距離的圓孔，一端又有小圓穿；但因殘斷而被改琢，現長僅二三公分。且在所餘的一個邊孔與柄端小孔之間，加鑽一邊孔。除了保持柄端原有之窪弧外，還於有刃的一邊，加琢一窪弧，以爲對應。與柄端相對應的一短邊，也就是殘斷處，磨成圓弧刀。除了器形改變外，還於器表兩面雕乙A式神祖面紋（圖三：2、3），於柄端邊緣的兩面，各雕半個甲A式神祖面紋，長髮旁有牛角形裝飾及丁B式鳳羽紋。由於神祖五官的描繪都是正面像，所以兩面拼合可得一正面像。（圖一：3）拓片及彩圖刊於一九九三年中日新聞出版的《上海博物館展》。

第二十六號，弗利爾刀。（圖四三）筆者於一九八〇、一九九二年觀察實物。

這件有名的玉刀藏於美國華盛頓市的弗利爾美術館。由於它曾經深沁熟盤，表面呈現灰藍、黃褐、赭紅等雜然斑剝的顏色，極爲溫潤美麗。整體略成斜梯形，除了兩長邊有刀背與刀刃之分外，兩端還有刀柄與刀鋒之別，刀背有三個圓孔。長七一·八，最寬一八·四公分。邊刃不鋒利，應純屬禮器。一九三八年 Alfred Salmons 在其著作 *Carved Jade of Ancient China* 中，首度發表照片。一九四五年梅原未治《支那古玉圖錄》中，公布拓片。林巳奈夫先生曾仔細描繪器表所琢的花紋，並做了深入的研究【註九】。本文圖四三，即是筆者利用林巳奈夫先生所繪之線圖，組合而成。柄端的器緣淺浮雕甲B式側面神祖面紋，神祖的冠帽及五官起伏，正構成了齒稜的凹凸，長髮後有牛角形裝飾，其上還插飾了丁B式鳳羽。（圖二：1）除了柄端這組淺浮雕的花紋外，這件玉刀上還有四組，以斷續細陰線刻繪之「虎與神祖」的組合式花紋，分別雕於一器之二

【註八】：鄧淑蘋：〈也談華西系統的玉器·三一玉刀〉，《故宮文物月刊》總號二二七，一九九三。

【註九】：同註四。

面，所在的部位，相互對應。讀者在圖四三中只能看到一面上的兩個組合圖。前節曾詳述這種戊B式虎紋的特徵，在其鼻頭前端，又有一甲B式神祖像。在虎背之上的器緣，琢作凹凸有致的齒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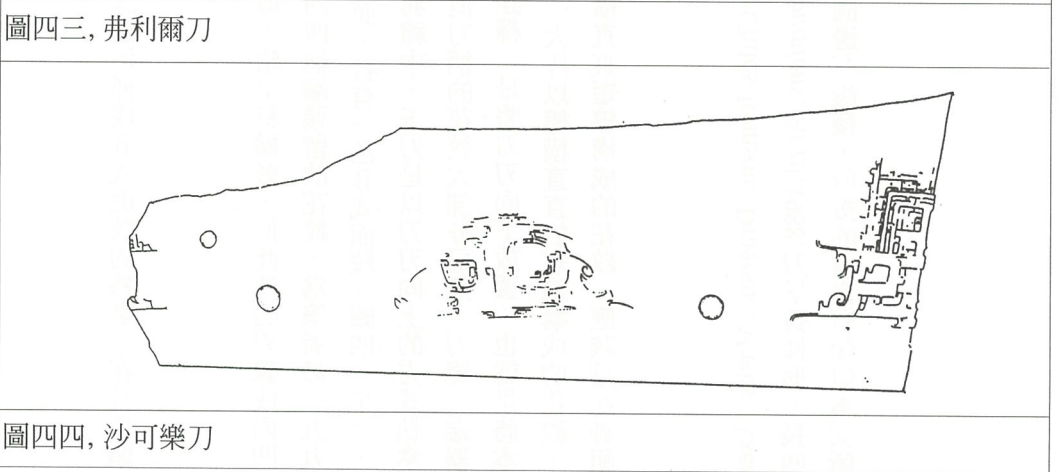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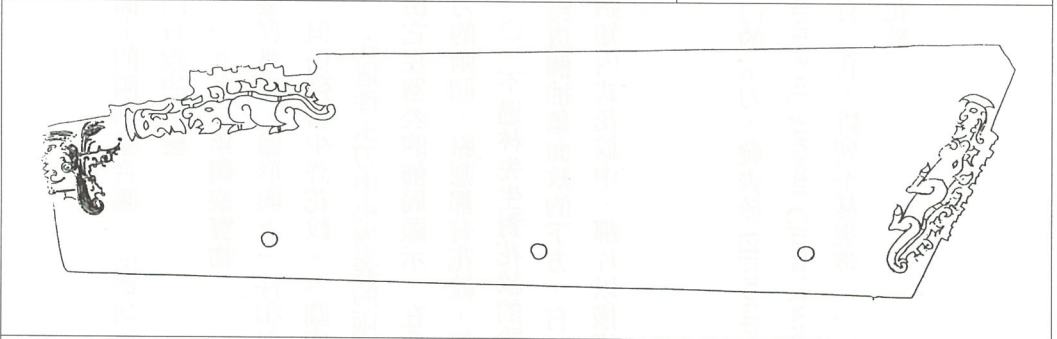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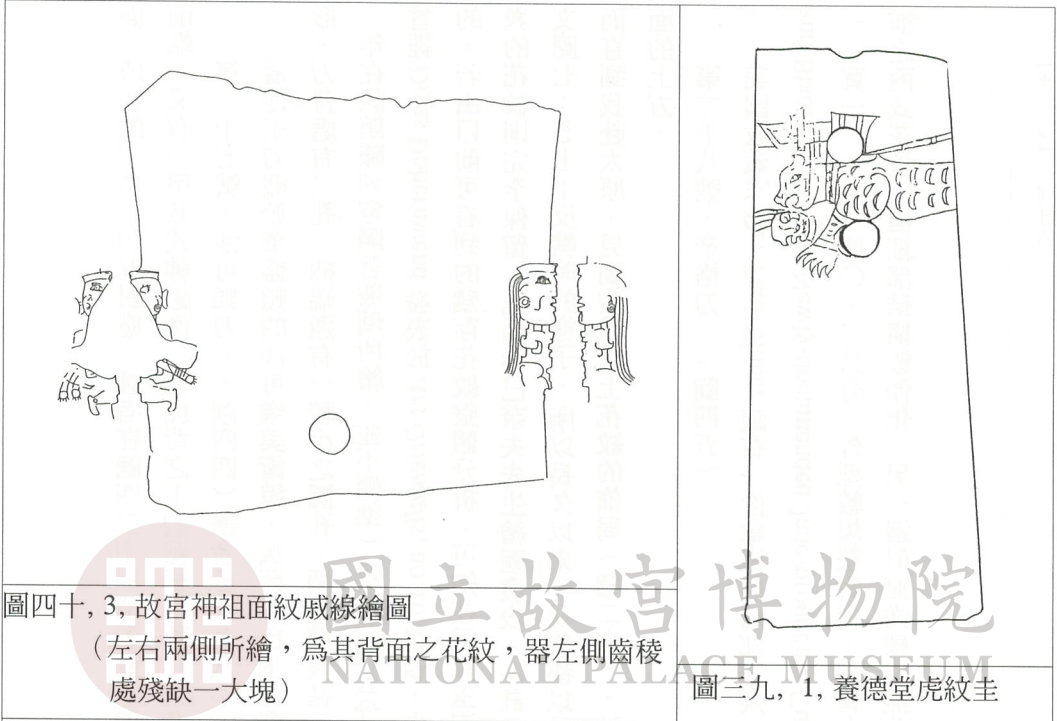
第二十七號，沙可樂刀。（圖四四）筆者於一九八〇、一九九二年觀察實物。

這件玉刀藏於華盛頓的沙可樂美術館。灰藍綠色玉，堅實溫潤。器形與上一件相似，略呈斜梯形，但此件的刃線成內凹形，刀背處有二孔，柄端還有一較小之圓孔。柄端殘破甚，但仍殘留少許花紋。（圖四四柄端殘留的花紋，為筆者於一九九二年在該館陳列室隔著玻璃所繪，並不標準）殘長四八公分。在這件玉刀中央器表的兩面，各有一乙B式面紋（圖四：7），曾經Doris Dohrenwend發表於*Ars Orientalis*, no.10, 1975。由它在器表的佈局顯示，在典禮中，玉刀是以刀刃向上的方式執拿的。若由目前可看到的殘存花紋整體分析，可知在這件玉刀的兩側，原應都有花紋，但刀柄的花紋大部分已殘，刀鋒一端器表的花紋則完全保留，已由林已奈夫先生繪圖發表。【註一〇】不過林先生對花紋的詮釋，是將刀刃向下放置，也就是將本文圖七：5上下反轉時的樣子。所以長久以來，我們都以為這個抽象面紋的下方，有一大片以橫橫直直的短線構成的花紋，而直到我赴太原，見到黎城戚上花紋的佈局（圖二十），始知丙式花紋中，那片以橫橫直直短線構成的花紋，應該是在神祖面的上方。

第二十八號，辛格刀。（圖四五）

美國收藏家Dr. Paul Singer藏有一件草綠色局部泛灰白的玉刀，發表於Elizabeth Childs-Johnson, *Dragons, Masks, Axes and Blades from Four Newly-documented Jade-producing Cultures of Ancient China, Orientations*, April, 1988. 刀呈長梯形。長四一，寬一一·六，厚〇·二公分。外型較規整對稱，刀背有三孔，排列不甚規整。一側邊有齒稜，所接的器表有類似本文所稱之丙式花紋，但細部結構較僵化。另一邊似無齒稜也無花紋。

【註一〇】：同註四。



Blade-Edged Jades with Eastern Yi Type Decorations (Part I)*

Teng, Shu-p'ing

(National Palace Museum, Taipei)

ABSTRACT**

The present article follows the completion of the author's "Blade-Edged Jades with Deity-Ancestor and Related Images" and a trip to T'ai-yüan and Hsi-an, which presented first-hand observation of jade *ch'i*-axes excavated from the site of Li-ch'eng in Shansi and jade knives (*tao*) from Lu-shan-mao in Shensi. These observations provide the inspiration for the author's further research and the results found in the present article.

Over the past 20 years, many scholarly essays have been published on a type of jade object carved with eagle, tiger, and deity-ancestor images (often referred to as animal-mask or human-mask designs). This jade can be generally divided into two major types. One has a blade, as represented by the *kuei* tablet, *ch'i*, and *tao*, while the other is an inlaid or decorative piece. Originally, scholars considered it to be from the Lung-shan Culture, based on excavation findings of jade *kuei* from the towns of Jih and Chao in Shantung. Referring to the content of legends and historical texts, the totemic reverence for birds among the ancient Eastern Yi tribe was used to hypothesize that this jade type served as a ritual object. In recent years, jade-inlaid and decorative pieces have been recovered among the excavated relics of the Shih-chia-ho Culture in the Hupeh-Hunan region. Forcing scholars to change their views, they hypothesize that these jades are mostly relics from the Shih-chia-ho Culture. To explain the great distance between Shantung and the Hupeh-Hunan region and the similarity in the style of the jades excavated there, scholars think that the Ch'ih-yu branch of the Eastern Yi tribe, after losing in a major battle in Chuo-lu,

* The article in Chinese appears from page 一 to 三四.

** Translated from the Chinese abstract on page 一 by Donald E. Brix.

migrated to the southwest.

In recent years, related materials have been added to the growing amount of evidence. The author, in addition to studying reliable jades from collections, also has traced these excavation materials, such as the Li-ch'eng *ch'i* and Lu-shan-mao *tao*. Altogether, 28 objects with blade-edges (including 20 *kuei*, 3 *yüeh*, and 5 *tao*) have been assembled for study. A close comparison of their mineralogical features and shapes as well as the combinations, developments, and changes in designs (assisted by historical materials and legends) offer evidence for further study. The author's initial hypothesis is that this type of jade was made from 2600 to 1500 BC, which correlates from the Lung-shan to the Erh-li-t'ou Culture and includes the Hsia Dynasty. The area in which they were carved was wide-ranging, extending from the provinces of Shansi, Shensi, and Kansu to the Kiangnan and Hupeh-Hunan regions, which all have yielded jades bearing Eastern Yi type decoration. This phenomenon suggests the growth of Eastern Yi power as it expanded its area of influence into other regions.

Generally, deity-ancestor images can be divided into three types. The first is human-like with facial features, including a countenance, hair, earrings, and crown. The second is an abstracted image dividable into four types, the basic features of which are as follows; circling line designs represent the eyes, the head is decorated with "ox-horn décor," and the head has a "crown-shape." Further analysis leads the author to believe that this represents an abstracted ox design. The third is a development on the second and is often composed of straight short lines for a decorative effect. These designs on blades often appear as opposing forms and are mostly composed of 1) eagle and deity-ancestor, 2) style-one deity-ancestor and style-two deity-ancestor, and 3) tiger and style-one deity-ancestor designs to create for three types of opposing relationships. Although the first and second type of deity-ancestor image design are different, a combination of the two appears on some blade-edged jades. By the time inlaid objects were made in the Shih-chia-ho Culture, it became a concrete expression of the style-one deity-ancestor image with the "ox-horn décor" and "crown-shape."

Through stylistic analysis, we are thus certain that eight of the objects represent typical relics of the Lung-shan Culture from Shantung. The opposing form relationship of the eagles and oxen in their decoration perhaps are images of Shao-hao and Ch'ih-yu from the Eastern Yi tribe. The others represent complex period and regional characteristics. The existence of jades with early and late as well as eastern and western styles provides scholars with a new lines of approach. In ancient texts are many records of tributary groups related to the Eastern Yi tribe, such as the Li group, the Ying-ch'in, and the Shao-hao-chih, which are recorded as moving west and south. This coincides more or less with the changes and transmission apparent from the analysis of these objects. Although the movements and changes among ancient cultures represents a complex issue, the author presents in this article some evidence for the study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ultures in the formation of Chinese civilization and the systems of jade ritual objects.

NATIONAL PALACE MUSEUM

Key Words

blade-edge 刃

ch'i 戚

Ch'ih-yu 蚩尤

deity-ancestor 神祖

Eastern Yi 東夷

kuei 圭

Lung-shan 龍山

Shih-chia-ho 石家河

tao 刀